



主编：卫任泉

编辑：《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零八宪章》网站：

<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零八宪章》论坛：<http://taolun.info/>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

xianzhang2008@aol.com

零八宪章
CHARTER 08

总第10期

2010年4月8日

目 录

【卷首语】

《零八宪章》论坛就港警拘捕香港支联会和平抗议人士的严正声明

【零八宪章】 文 本

【特别关注】 赵连海 山西疫苗事件

- 1、赵连海的无罪辩护（陈述）词
- 2、一个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这一年 许志永
- 3、王克勤：为苍生事 死何以惧
- 4、公民签名呼吁公开公正调查山西疫苗重大事件

【宪章动态】

日内瓦人权、宽容和民主峰会开幕，杨建利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零八宪章》

【宪章论坛】

- 1、高扬《宪章》大旗，开展“立体维权”
——写给十字路口上的《零八宪章》 赵常青
- 2、从上书请愿到街头运动：立宪党人的时代抉择 黎建军
- 3、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孙立平
- 4、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吴高兴
- 5、知识分子的职守与放弃 狄 马
- 6、人权、人的尊严与猪权、猪的尊严 王德邦

【宪章时评】

- 提升人的尊严 沙叶新
- 谷歌的“不作恶”与中国当局的“贼喊捉贼” 小 乔
- 郭建梅及其团队声明 李 莉
- 纪录片《克拉玛依》被大陆当局禁播

【经典文献】

美国独立宣言

【卷首语】

《零八宪章》论坛就港警拘捕香港支联会和平抗议人士的严正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惊悉2010年3月11日上午8点左右，香港支联会五名常委梁国华、李耀基、李卓人、蔡耀昌、梁国雄和四五行动成员古思尧被香港总区重案组警员拘捕。香港警方无端指控支联会于2009年12月25日，联同其它关注刘晓波的团体和人士，在中联办以和平方式抗议中共重判刘晓波11年，支持《零八宪章》的集会是非法集会，有扰乱秩序及挑拨性的行为。他们五人将于本月18日上午9点30分在香港东区法院第一庭出庭。

对于香港警方这一赤裸裸的打击和平集会，以言定罪，践踏国际公认的人权法则，侵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有明确针对性的、疯狂的政治迫害行径，《零八宪章》论坛在此表达最强烈的谴责，并正告警方：你们这种恶劣而卑鄙的政治迫害行径已经遭到了一切爱好自由和民主的香港人民与大陆人民的共同唾弃！

《零八宪章》论坛奉劝香港当局和警方中的某些顽固分子，要认清自由民主法制的历史大趋势，立即停止一切疯狂而滑稽的政治冒险，回到尊重人权的正确立场上来，同时，希望港方能恪守自己的人性良知，维护香港的真正法治，而不要去充当中共某些强硬分子镇压香港民主和人权力量的工具和爪牙，不要干自己把自己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蠢事。

20年来，香港支联会持续不断地支持大陆民主化进程，他们不畏强权，坚韧抗争，一直在为争取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六四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而奋斗努力。《零八宪章》论坛在此向香港支联会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向遭到拘捕的梁国华、李耀基、李卓人、蔡耀昌、梁国雄和古思尧等多位先生表达最深切的问候！

今天，香港与大陆已经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香港民主化的每一件事情都与大陆人民的福祉紧密相连。对所有坚持独裁专制立场的顽固分子，无论他们在香港还是大陆，我们都予以共同的反对和谴责，大陆的民主力量永远和香港的民主力量站在一起。香港人民和大陆人民将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事业而奋斗努力，不分彼此，互相援助！

港警如此枉法拘捕和平集会人士，不仅严重损害了香港法治形象，导致法治倒退，而且给台湾回归制造障碍，使台湾人民增加对回归后人权与法治保障问题的恐惧。

“零八宪章”论坛特此强烈要求：

- 一、 港方立刻无条件释放被抓的港支联及四五行动等六名和平集会抗议者！
- 二、 对践行宪法权利而被抓的诸君赔礼道歉，并作出国家赔偿，以警后来！
- 三、 港方严守法治精神，戒除一切政治干扰，切实保障港人的人权与自由！

2010年3月13日星期六

（源于：“零八宪章”论坛）

【零八宪章】 文 本

零 八 宪 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改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党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开展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略）

《零八宪章》网站：<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零八宪章》论坛：<http://taolun.info/>

【特别关注】 赵连海 山西疫苗事件

赵连海的无罪辩护（陈述）词

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京大检刑诉[2010]0043号起诉书”指控我涉嫌寻衅滋事罪的起诉，我将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及辩护。

首先，我不认同起诉书指控我以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他人在多个公共场所呼喊口号，非法聚集起哄闹事等事情。下面我就指控内容作必要的简要说明。

起诉书指控所谓社会热点问题的事情主要有二个，一是有关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事件，此事件泛称“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此事件与我密切相关，我的孩子就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侵害的幼童之一，我也是此事件维权带头人。第二个事情是有关2009年8月4日安徽上访女青年李蕊蕊来京上访被外地政府驻京办截访人员非法关押并被强奸的事情，我在当天协同李蕊蕊及事件证人去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先说三聚氰胺毒奶事件维权：起诉书指控我“于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间，利用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多人先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及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等地公共场所采用呼喊口号、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就这些指控我要提出反对意见，首先我们要简要说明起诉书所说的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就是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举世震惊并令众多受害家庭痛苦至极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我年幼的孩子即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侵害的肾结石宝宝。我的孩子从小母乳喂养，在一岁多后开始消费各种乳制品，截止到他被确诊为肾结石患儿之前，已累计消费了长达二年多大量的含三聚氰胺的有毒乳制品，涉及的种类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含奶制品。孩子在被确诊后，我们身为孩子的父母想到孩子曾消费的乳制品数量之多，时间之长我们的心情是极其痛苦并担忧的，想必每个有血肉的人都会理解我们的痛苦与担心，那些痛苦的经历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痛苦及担心焦虑程度在此暂不多述。

悲剧在我们尚小的孩子身上发生后，身为受害患儿家长的我及众多受害家庭自然想到为我们尚小的孩子维权并为孩子们一生的健康保障呼吁。我们众多受害家庭由此因孩子自发的走到了一起，组建我们的维权团体，但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孩子被无情的残害，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压力与阻挠，让我们众多家庭经历了更多新的伤害与痛苦。但我们在即便非常痛苦的维权过程中依然做到了理智。我本人也作为结石宝宝维权带头人与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的积极沟通及反馈，但我们提出的太多积极的合理性建议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即便如此，我们众多家长依然克制着我们痛苦委屈的情绪，继续理智的与相关部门沟通呼吁，期望相关部门能正视我们受害群体的痛苦心声。我们众多家庭相互安慰、相互帮助，也极力劝抚帮助那些被伤害更严重的家庭愤怒不理性的情绪，避免发生其它更不想看到的悲剧。我们理性、积极的方式让有些例如死亡、手术等严重情况更痛苦的家庭感受到很多安慰，及时避免了多例危险事件的发生。说到此，应肯定我们的维权团体起到的积极有益的作用。

2008 年 12 月中旬，我们众多家长得知政府即将出台赔偿方案（并且我们也认为那个赔偿方案是打发人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赔偿方案，是没有与众多受害家庭协商沟通、且不尊重受害家庭的方案）。我们众多受害家庭得知这些情况后自然想到结石宝宝事件也将会随之淡落的处理下去，我们太多家长想到我们孩子后续定期检查、继续治疗、永久健康保障以及三聚氰胺深度危害等等实际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我们的心情是焦虑不安的。在这样的心情下，我们与相关部门沟通的愿望更加强烈，我们期望能与相关部门及企业进行彼此坦诚的沟通对话，我们也期望我们真诚的态度能让相关部门及企业重视依然存在众多问题及听取我们对事件解决的建议。

我们曾努力与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部门积极沟通但都被无情拒绝。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痛苦无奈的，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在尊重我们做为受害家庭的前提下，更合理、更公平、更公正的能与众多受害家庭协商来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把孩子们的生命健康放在最重要的高度来重视。当时的情况大致是：有很多需要住院甚至手术的孩子都被拒绝免费治疗，致使一些孩子的治疗被严重人为的拖延，让孩子们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还有例如有的孩子由于漏报等情况根本就没有列入国家承认的结石宝宝名单，导致各种治疗费用都由受害家庭自己来承担，而有的孩子更是在事件被曝光前就已治疗或手术多次，家庭已为此不堪重负而债台高筑，而孩子依然面临继续治疗而需要的高昂费用，很多前期或后期治疗费用都不给予解决，而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继续死亡的结石宝宝患儿除了不被承认死因与三聚氰胺有关，并且在死亡患儿家长就死因提出质疑后申请尸体检验来确定死因竟被拒绝。例如：2008 年 12 月 4 日死亡的湖北麻城的马雪菲小朋友（女孩，死亡时仅 1 岁，她的相关资料在我被警方扣押的电脑里有）。马雪菲在 12 月 4 日死亡前就已被承认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侵害的结石宝宝，但相关部门在她死亡后否认她的死亡与三聚氰胺有关。马雪菲在死亡之前就已因肾结石导致肾积水无法排尿在医院进行过置管、排尿排石手术，也曾有国内媒体对当时在医院治疗的马雪菲作过报道。马雪菲死亡后，我们众多家庭及相关专业人士怀疑是肾小管里依然有三聚氰胺颗粒导致肾脏或其它器官严重受损导致生命出现危险，故都想到只有通过严谨的尸体解剖检验才能确定最终死因，但相关部门在否认马雪菲的死因与三聚氰胺有关之后却拒绝推诿家属提出的尸检申请（稍后在 09 年 1 月 6 日死亡的山东青州候海淇小朋友也是被如此对待，候海淇家长将孩子尸体在医院停尸房冷冻多日找过多个相关部门提出尸检申请都被拒绝）。

马雪菲死亡后对她及其他新死亡患儿进行严谨的医学检验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对死因有更明确的判定标准牵扯到对其家庭的赔偿等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严谨的医学检验、病理学研究、通过尸检对肾脏、肝脏、心血管系统等重要内脏器官进行切片等专业的病理学研究来更深入地了解被三聚氰胺侵害的结石宝宝的肾脏等重要器官到底造成了如何伤害，伤害到何种程度、长远潜在危害到什么程度等等。这样的研究重要且必要，也将对至少官方公布的 30 万结石宝宝的后续治疗、长期监控防治有重要价值，但这样难得的实体研究竟然在家属的积极申请下被浪费甚至推诿拒绝，让我们实在不能理解并心痛，看到 2008 年东北因三聚氰胺饲料死亡的动物貉子在解剖后肾脏被严重侵害的照片（我被扣押的电脑里有照片及相关资料），让我们更加想了解三聚氰胺乳制品到底对我们的孩子们的肾脏等器官具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2008 年 12 月中下旬，我们在种种疑虑，担忧及与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相关部门沟通被彻底拒绝或置之不理后自然想到通过媒体反映我们关心的问题及建议，并期望我们的呼吁能得到相关部门及社会的高度重视。在我们众多家长自发的商议下，最终决定于 2009 年 1 月 2 日下午在丰台区的一家停业的酒店中餐厅与媒体记者见面反映我们的呼吁及发现的问题。担心这个见面

会被干扰，我们选择的这个酒店地处非常僻静。在与该酒店中餐厅负责人事先商谈后，他们也非常乐意于将中餐厅租用给我们使用并彻底约定下来。

1月2日的这个事情本可以进行的非常顺利，但我在1月1日晚即被警方在丰台区强制控制，与我同时被控制的还有其他4个家长代表（他们都是孩子受伤害很严重且都动过手术患儿的家长）。我们在1月1日晚被警方强制关押在大兴区团河农场会议中心内，在我们提出意见后，警方告诉我们第二天上午将有领导与我们谈话沟通，并承诺我们第二天上午11点前无论谈话是什么结果都肯定会释放我们。

当天晚上我们晚饭也没吃，我们几个人就在多名警察看押下在团河会议中心一个会议室的椅子上又饿、又困、又累的坐了一夜，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满怀期待第二天上午的谈话能有好的进展，期望领导们能倾听我们的建议。第二天上午，我作为代表与到来的领导们进行了谈话，我谈了很多我们面临的实际困难、问题及建议，并明确表达了期望政府能协调相关部门及企业与我们进行沟通的诚意。但当天上午现场的领导们不仅不理解我们的合理诉求及建议，反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一味的强加我们他们的意见，一上午的对话明显在被压制的状态下进行，并且在时至11点后也不按他们曾经的承诺释放我们。

时至下午，我们依然被强制看押在团河会议中心内，位于丰台区那个酒店的记者见面会如期但被严重干扰的在进行，其他几个没有被控制的家长代表和一些媒体记者赶到了那里，但到后才得知该酒店及中餐厅不能再继续租用给我们使用，酒店外也有警车及警方人员在现场（事后证实当天警方介入要求该中餐厅停止给我们租用），那些家长与到达的记者由于无法进入中餐厅，只好在酒店的大厅及酒店门口的便道上进行了简短的访谈，后由于担心我们几个被关押在团河会议中心，几个家长随即赶到了团河会议中心来关注并询问为什么关押我们。当天下午在团河会议中心的警官找到我说有家长在会议中心外要求释放我们或进来见我们，让我劝劝他们，情绪不要激动。我当即非常配合的与在会议中心外的家长们通了电话，让他们都冷静，不要冲动，在我与会议中心内警官们的请求下，最终让在外面的家长们进来避冷。

在当天最后，政府官员又与我们进行了谈话，同意我们只要不在1月4日至1月15日推行赔偿方案期间不公开反对赔偿方案即协调我们与相关部门及企业的沟通，展开对话机制解决遗留问题，至此才将我们释放并请我们在大兴区的一家餐厅的一个包间吃了一顿饭并在第二天陆续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中。

简述当天在丰台区及大兴区的情况即是：我们没有进行起诉书内所指控的我煽动纠集多人在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采用呼喊口号，非法聚集方式起哄闹事，更不承认我们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警方的强行介入阻止，1月2日的事情会进行的更好，在当天因此而造成的任何不良影响都应由警方负责。并且我们每个家长在当天也都极力配合了现场警方的协调或指挥，并且当天也有众多媒体记者在现场可以作证，如法庭不认同我的辩解，我将请求法庭允许当天去现场的家长及媒体记者出庭作证。

综上所述，我完全不认同起诉书对我的指控内容，我不认同指控我煽动纠集多人在北京丰台区、大兴区的犯罪指控，我也不认同我们是非法聚会，更不存在呼喊口号、起哄闹事的情况。上面是2009年1月2日在北京丰台区及大兴区的大致情况。

再次在大兴区的聚会就是 2009 年 9 月 11 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被正式曝光一周年当天，我们几个受害家长代表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餐厅的包间内进行了一个小型的回顾性座谈会及傍晚后进行了一个短暂的烛光纪念活动。我们选择的这个地点也是年初 1 月 2 日官方请我们吃饭的那个饭店、那个包间，我们也期望借此提醒官方年初对我们的承诺。我们以此来悼念因三聚氰胺毒奶死亡的孩子，并祈祷祝福所有手术及被侵害幸存的孩子们能一生健康幸福的成长。

这次结石宝宝周年聚会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批准，并且当天现场的秩序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有质疑，请参见我们当天拍摄记录的全程录像，该《结实宝宝周年纪念》录像在我被扣押的电脑里或网络上也可下载到，我也期望我们当天凝重悲恸的气氛能打动每位观赏者并有所深思。我们作为成年人到底该为我们的后代为所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结实宝宝周年纪念》座谈会录像在我此次被强制关押前正准备随同另一份刚刚完稿的致卫生部的问题汇总反馈函一并提交给相关部门以期得到重视（该问题汇总反馈函也在我被扣押的电脑内），在此再次提醒相关部门依然要重视并解决三聚氰胺事件遗留的所有问题，尤其最重点的是三聚氰胺对人体尤其是对孩子们长期的潜在伤害及威胁。

其它一年期间内的多次致卫生部信访办，国家质检总局信访办，国家信访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上访反映问题的地点都不属于起诉书所说的丰台区、大兴区、也不存在任何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故不必叙述。

下面再简述起诉书提及的河北石家庄情况。

我在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后一共去过 4 次石家庄分别是 2009 年 1 月 16 日、1 月 22 日、3 月 4 日及 6 月 24 日。下面开始简述。

先说第一次：1 月 16 日去石家庄，1 月 16 日前 2 天，在网络上有传言说 16 日上午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宣判田文华，我们一些家长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商议我们作为受害孩子家长应该到现场去关注庭审结果并接触到现场的媒体反映我们的问题，期望引起重视。但 16 日早上我与另外两个家长到达石家庄中法后才得知那是一个假消息，当天去了，三五家媒体与我们简短谈了一会儿就各自回家了，这是 1 月 16 日的情况，不存在任何起诉书内指控的情况。

再说第二次：1 月 22 日，这次审判田文华是真实的，我们共有 7 个家长代表自发的到了石家庄中法，下面说说这天情况。

当天我们到达中法后，中法已实行全面戒严状态，众多防暴警察及治安警察在中法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并组成严实的人墙阻止无特殊通行证的人员进入。我们当天在现场是非常理智的，与维护警戒线的警察们沟通得知我们不可以穿过警戒线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我们也理智的按警方的要求在指定地点待着。我们在警方指定的地点与媒体记者谈我们亟待解决并急需重视的重要问题，我们最关心的还主要是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期间，记者拍摄了我们手拿写有“关爱孩子健康”等字样的 A4 纸，但我不认为此行为构成犯罪。

当天，我们在那里是非常理智的，没有起诉书指控的任何行为发生，并且也一切听从了现场警方的指挥与协调，让我们在哪待着，我们就在哪待着，更没有所谓呼喊口号，起哄闹事等行为

发生。并且在审判田文华结束后也各自尽快的离开了石家庄。

当天现场情况也有众多媒体记者可以作证。如法庭不认同我的辩解，我请求法庭允许当天在现场的众多记者到庭为我作证。

上面是 1 月 22 日在石家庄的情况，不存在任何起诉书指控的行为。

再说第三次 3 月 4 日，这天是曾经的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名牌产品等众多荣誉于一身的三鹿集团剩余资产被拍卖的日子。我们作为结实宝宝的家长们，理应来关注这次拍卖，我们也期望能表达我们合理的意见：即将拍卖的剩余资产优先用于受害家庭尤其是很多被拒绝免费治疗的孩子。

当天情况是：我们 4 个家长开乘一辆车前往石家庄中法拍卖现场，但我们的车辆被石家庄警方刻意的阻挠下本能 10 分钟的车程就赶到中法，但却千辛万苦的经过几个小时后才到达。我们到达中法后拍卖会已经结束，后有记者给我们打电话告知我们正在三鹿集团进行拍卖后的新闻发布会，我们随即赶了过去，但三鹿集团当天组织了大量人员阻拦我们，我们在请求进入未同意的情况下也没有强行进入等过激行为发生，并且在当天大量三鹿人员将我们围堵在角落里甚至将一位死亡患儿的奶奶拉扯在地上的情况下我们依然保持了极强的克制力。最后我们在极度委屈的心情下离开了。当天也有石家庄警方在现场，也没有指出我们有任何构成犯罪的行为。我们也认为我们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更不存在起诉书指控的内容。

第四次去石家庄是 6 月 24 日，当天我与另外 3 名家长代表去向石家庄新华区人民法院，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我们受害家庭致全国各级法院系统的公开信，期望能公平、公正进行三聚氰胺民事诉讼案，当天递交过程非常顺利，更不存在起诉书内所指控的任何行为。

以上是四次去石家庄的大致情况，综上所述，我不认为我这 4 次在石家庄的行为构成犯罪，并且我还要重点强调，我的每次出行都有警方人员在现场或随从，没有任何警方人员提示说我们的行为构成犯罪，故此，我更认为我上述事情都没有构成犯罪。

自 2008 年 9 月 11 日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来，我作为维权带头人被警方多次谈话，但从未提及我曾经的事情构成犯罪，另在 2009 年 7 月后因准备进行结石宝宝周年纪念，与警方再多次频繁解除沟通，在 7 月至 9 月 11 日结石宝宝周年长达两个月与警方多次接触的时间里，也多次谈及曾经的这些事情也从未指出我这些事情构成犯罪，并一再好意的劝告我千万别有什么冲动的事情发生构成犯罪。这些情况也证实我曾经的事情并没有被警方认为是犯罪，我也没有因这些事情收到过警告或提示说我构成犯罪，让我不能理解并痛心的是事后竟指控我那些在警方严密监控下的事情构成犯罪。

我们身为被伤害的孩子们的父母们，我们是希望切实解决发生在我们孩子们身上的伤害以及有效保障我们孩子们一生的健康。迄今为止，不仅仅中国甚至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敢断言三聚氰胺对孩子们的伤害仅仅是肾结石，而已有的研究和相关报道都是让我们紧张并焦虑的，我们至今担心一些隐性的伤害将会影响孩子们一生的健康。

世卫组织发布的通报明确提到了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三聚氰胺是可以导致动物有膀胱癌等病变发生（请参见世卫组织中文网站内有关三聚氰胺病理学方面的研究通报），而我们在国内也通过南方都市报 08 年底有关三聚氰胺的专题系列报道了解到东北喂养三聚氰胺饲料而亡的动物貉子的尸体解剖后发现肾脏都有明显的严重破坏，其被破坏残蚀的肾脏实物照片让我们每个给孩子消费过三聚氰胺产品的孩子家长都不得不心有余悸，恐惧万分，并且这种担忧并未随着孩子结石的消失而停止。我们迄今仍强烈呼吁相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尽快出台公示相关的专业研究及进展情况，防患于未然。

我们身为孩子的家长最关心孩子们生命健康及一生有效地保障，我们的维权也一直是合理合法且理性文明的，我们也从没有指控的所谓“非法聚集，呼喊口号，起哄闹事”等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情。

最后，再说起诉书指控的 2009 年 8 月 4 日的事情。

这天起因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被关押在外地政府驻京办私自设置非法关押访民的一个黑监狱中，在当天竟骇人听闻的发生了一起性质及其恶劣的黑监狱看押人员当众强奸安徽上访女青年李蕊蕊的事件。我在当天得到求救的消息后去营救她们，在前往的路上得知她们自己闯出被关押的黑监狱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报案的路上又被截访人员拦截的情况下，只能更加义无反顾的赶过去营救，担心刚刚逃出魔窟的她们再陷入恶境，并最终协助了李蕊蕊她们成功报了案。对于这次极其正常并属于见义勇为的报案，竟被指控为煽动纠集多人起哄闹事，对于这样的指控不能不令我心痛，我们正确并带有正直的行为谈何犯罪呢？

对于本指控我完全不认同，我们在当天不仅没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发生，并且在警方强行抓人导致吓跑一些访民的情况下，将一切害怕且跑开的当事人及证人劝说留了下来，我不仅不认为我当天的行为构成犯罪，反倒更认为当天在我的坚持及推动下能得以最终报案、立案成功，得以最终有效地打击了罪犯，在我及多名访民证人被东交民巷派出所强行扣留关押一天后，8 月 5 日中午警方多名领导找我谈话说马上释放我们，但要求我们走后不要再对记者多提这个事情了，然后就让我们就离开了。

从 8 月 4 日被强行关押直至 8 月 5 日离开，警方自始至终也未说我们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故此，我不认为我在 8 月 4 日的行为有任何犯罪成分。如果法庭认为我的行为构成犯罪，那我认为是真正犯罪分子无形的庇护，是对正确行为的打击，由此会导致的不良后果不堪设想，正义、正直被压制的情况下只能让真正的犯罪分子更加嚣张，也将会错误引导正确的是非判断观。故此，请法庭慎重考虑，并作出正确的判定。

我在 8 月 4 日当天的所作所为，可由多位当天现场的当事人作证，如法庭不认同我的辩解，我将请求相关证人出庭为我作证。

以上是我就起诉书指控的内容做的必要说明。

我身为一名结石宝宝的父亲及社会的一员，我坚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来所做的事情没有犯罪，我反而要自豪骄傲于我所做的所有努力，我在尽力尽职我应肩负的责任，我也期望自己曾经的所有努力与付出能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并且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无愧于我自己的良心、

无愧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我认为我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反而我倒认为如果我不去做这些事情，我将认为是一个罪人有愧于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也有愧有罪于我身处的时代及我们的后代，我们努力让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更加高尚，坚定我们正确的做人信念，并期待能对社会进步有积极有益的作用。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有责任坚持正确的事情并让人为的错误尽量减少。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使命为我们的后代努力营造一个更有道德、更公正、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环境。

我因为维权及协助别人报案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失去自由，在此我期忘这样的伤害与委屈尽快结束，并期望是非被颠倒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在此，我要说：如果维权有罪，那势必会助长利欲熏心的奸商继续丧尽天良、肆无忌惮的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残害他人的基础上，我们本已日渐沦丧的社会将会变成何等扭曲的样子。

在此，我更要说：如果报案及揭示犯罪有罪，将会就此扼杀正直的行为，将会纵容更多的罪犯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如果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将处于危险的社会之中，正义与勇敢将逐渐不复存在，想必这是每个具有良知善德的人都不想看到的。

今天的我，由于错误的指控被强行关押失去了自由，我所能期待的也只有祈盼法律应有的公平公正来为我主持正义还我于清白。在此也真诚期望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能正视已犯下的错误，不要一错再错。

我坚信，正义与真理的光芒必将照耀我们这个国度的每个角落，而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倔强的坚持，不为别的，仅仅为了我自己良心与灵魂的安稳，以及为了我们的后代们能生活在一个具有优良品质的社会里，更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度能以健康的体魄继续存在于世界。

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犯罪，也期望拥有权力的人能拥有高尚的人格与美德，想想所有被三聚氰胺毒奶残害的孩子们，秉持惩恶扬善的准则，做出无愧于这个国度、无愧于良知与灵魂及无愧于子孙后代的决定。这样，我们才无愧于我们做为一个生命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国度的意义。

最后，我要再重申，我没有进行起诉书内指控的犯罪行为，我坚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身为一名公民应担当的一份责任，我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文明且没有错误的，我也祈盼自己的努力能让社会有所进步。

为了将正直、良知的品德保留在我们的生命及灵魂中，我们只能坚定的信念和准则，否则将动摇我们正直的心灵并错误的影响我们的后代，那样，我们才将是罪人。

综上所述及事实，我坚信我无罪！

辩护陈述人：赵连海

2010年3月

一个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这一年

许志永

2008 年 9 月初，甘肃省报道多例结石患儿，结石宝宝问题浮出水面。后来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和温总理接受网友提问时的回答，有 3000 万儿童受害，其中确诊结石的患儿近 30 万。这其中有一个结石患儿的父亲，名字叫赵连海，2008 年 9 月 20 日，赵连海之子（三岁零八个月），确诊左肾结石。

赵连海，1972 年生，北京市民，住大兴区团和农场。曾在电视台，国家工商总局的广告公司，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质量报》等多家媒体工作过多年。朋友们对其评价为：“豪爽热情，厚道仗义。”

2008 年 9 月 22 日，赵连海在网上发布呼吁：希望受害者家长组成统一诉讼联盟，准备迎接此后漫长的集体诉讼，希望以法治的方式实现正义。

2008 年 9 月 24 日，赵连海创建“毒牛奶”网站，两天后，为了更中性温和，网站更名为“结石宝宝”网站。但网站很快被屏蔽。

2008 年 10 月 2 日，赵连海转发“公盟倡议理性对待三鹿奶粉事件”的文章，并前往超市，购买二箱贴有“经过三聚氰胺检测”标识之牛奶，希望能帮助到愿意改过的企业和无辜奶农，以支持民族工业。

2008 年 11 月 25 日，赵连海召集部分结石宝宝家长代表，和公益律师、民间 NGO 代表、媒体一起探讨赔偿事宜，研究公正的理性的赔偿方案，推动国家赔偿方案出台。出席研讨会的家长代表包括来自湖北的廖明波，他的女儿 2005 年以来已动了三次手术，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疤，以及来自甘肃兰州的张龙、裴金鸣、高玲，来自浙江杭州的杨勇，来自江苏苏州的周雄等受害者家属，他们的孩子，有的是双肾多发结石，有的是单肾结石，还有的肾积水，无辜的孩子们，正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2008 年 12 月 27 日，22 家责任企业表示，愿意对近 30 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这是政府部门和责任企业协商的结果，赔偿方案主要内容是：死亡的患儿每个家庭赔偿 20 万元，动过手术的重症患儿赔偿 3 万元，普通的结石患儿每个家庭 2000 元。整个赔偿方案制定没有患儿家长参与。一些患儿直到 2010 年 3 月 30 日赵连海开庭受审仍在治疗，而他们家庭一共获得 2000 元赔偿。2009 年元旦，赵连海和其它家长认为，这个一次性赔付方案不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协商基础上的，遂提出了申诉书。

2009 年元月 2 日，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赵连海等五名结石宝宝家长，被警方控制在大兴区劳教农场。原定举行招待会的场地被封锁，其余家长在路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元月3日，被释放后，赵连海向媒体指出，警方控制家长没有法律依据。不过，他坚持“家长的声音是善意的，将继续与官方沟通。”他并透露，关押期间，大兴区区长承诺1月15日后与民间建立沟通渠道，家长们也承诺在15日以前不针对现在的赔偿方案发表意见，并希望看到官方真正地重视受害家庭。……

2009年3月3日，石家庄三鹿集团拍卖前一天，赵连海和其它几位家长多次被阻拦出门，直到当晚十一点，赵连海和其它家长到达石家庄住进旅馆。第二天早上开庭前，家长们遭遇“临时交通管制”，他们乘坐出租车，又被拦截，于是下车步行3、4公里赶往法院。到法院附近，家长们被强行带到一个封闭的屋子里，他们抗争并高呼“不要再伤害我们！”最后得以脱身。当他们最后到了法院，拍卖已经结束。

家长们又赶往三鹿集团，到达后又被一些人包围推搡，甚至把上了年纪的郑书贞阿姨拉扯在地上拖拽。赵连海等人只好高声呵斥他们，并向从三鹿集团里出来的记者们举起抗议纸张……

2009年6月，因为到此时只有两位受害人之诉讼请求得到受理，也因为政府承诺过的赔偿方案却被保险公司推说“有些家庭没有文件”拒绝付款，这些受害家庭不得不自己垫付治疗费——

为此，赵连海发布致最高法院及全各级法院的公开信：“鉴于我们的孩子所受到的无辜伤害，政府主导的赔偿对于我们来说，显失公平，而个体诉讼让我们的家庭增加更大的诉讼成本与难度”，从而希望“法院继续受理集体诉讼以及其他合理要求。”

2009年6月24日，赵连海等四位受害者家长前往石家庄，向三级法院提交了公开信，并提出一些要求：“希望尽快开庭审理已经受理的两件索赔案，希望允许受害者依法选择在产品生产地、案发地、居住地诉讼，希望肯定集体诉讼，希望免除诉讼费用等”如此，“我们民间也会本着宽恕谅解的心态来对待。”

2009年6月27日，赵连海接待了河南结石宝宝家长：因小儿麻痹症留下残疾、行动极为艰难的郭彩虹。并在博客里发布了她的文章：《我痛苦所以我坚持》。7月，发布“把九月十一日定为结石宝宝纪念日”的呼吁书，以求提醒大家“爱护我们民族的所有儿童”。

2009年8月4日，赵连海接到网友短信，关押上访人员的“聚源宾馆”，看守强奸了一位安徽上访女孩，赵连海赶过去，和逃出聚源宾馆、正前往北京公安局报案的访民汇合。

到北京市公安局后，因为此前市局曾多次将逃出灰色宾馆的访民移交回丰台局、回驻京办，所以大家不敢贸然进入市局，而是在离市局大门东侧几十米远的人行道上彷徨迟疑，并接受了媒体采访。现场访民网友“态度安静，并无横幅、口号、阻碍交通等事，过往行人，通行无碍。”下午两点左右，在场访民网友包括赵连海被警方控制，带至东交民巷派出所讯问二十四小时后放出。

2009年9月11日，和其它受害者家长举行烛光晚会，悼念逝去的孩子，并祝福继续生存的孩子，“纪念活动进行的非常顺利，过程肃穆庄重。”（图片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jieshibaobao/archives/339284.aspx>）赵连海表示：“感谢北京政府的理解及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也期望在今后能继续延续相互理解与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所有其他遗留问题。”

2009 年 9 月 12 日，赵连海被立案侦查。

2009 年 10 月 30 日，针对 29 日“赵连海被捕”之传言，“本着事实客观的态度”出面澄清。

2009 年 11 月 4 日，赵连海发布来自法院的信息，全国第一例确定公开审理之三聚氰胺毒奶索赔诉讼案件“王刚诉石家庄三鹿集团案”，将于 11 月 10 日在大兴区法院开庭。11 月 5 日，结石宝宝家长王刚被海淀区羊坊店派出所搜查并背铐了两个多小时。同时法院通知庭审取消。赵连海发布抗议书并征集签名，11 月 13 日递交有五百多位网友签名之抗议书。

2009 年 11 月 13 日晚，赵连海被大兴公安局从家中带走。

2009 年最后一天，上海熊猫乳品产销三聚氰胺超标乳制品的消息被公布。此前 20 多天，陕西金桥乳业曝出类似问题。与上次不同，这次三聚氰胺的来源，乃是 08 年三鹿风波后，被召回的问题奶粉并未销毁，而是被企业存起来，如今再次利用。

2010 年 3 月 30 日上午，赵连海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在大兴法院开庭。检方指控赵连海的“犯罪”事实就是以上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和那个被强奸的女孩维护权利。

谨以此，感谢那些为奶粉患儿的正义，也为我们民族法治文明的未来而抗争的家长们。

2010 年 3 月 30 日

（源于：《观察》[<http://www.guancha.org>]）

王克勤：为苍生事 死何以惧

【浦志强按】山西疫苗出了这么大的事，令人意外和无比痛心；山西当局的反应，卫生部的沉默，不出人的意料，令人心寒齿冷。指责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失实，借宣传部和记协之手断了王克勤的生路，是山西方面再正常不过的条件反射，以维稳名义将可能暴露真相的家长“保护”起来，用西南旱情、王家岭矿难和莫斯科地铁爆炸，来转移公众视线，说不定会成为山西的自然选择。好在，经王克勤引爆的山西疫苗黑幕，已牵扯出江苏河北两省不合格疫苗生产企业的骄人业绩，奇怪的是他们又刚刚得到国家药监局的大宗订单，不光能预防狂犬病，而且还能治猪流感。我愿意相信好人克勤会一生平安，但我们必须要关心他，关注他帮过的苦命人。哪怕他心甘情愿为苍生牺牲自己，身为苍生的我们却不应当再麻木下去，因为我们不能让他这样的好人牺牲掉。

一句话，敦促卫生部彻查疫苗黑幕，尽快找到真正的黑手，让一切水落石出，包括问责民主党派出身的卫生部部长陈竺。

把这篇稿子转贴到凯迪猫眼，得到了这样一份短信息通知：在 2010-3-31 22:55:51，值班编辑 08 给您发送的消息！“消息标题：系统消息，您发表的帖子《[转贴]王克勤：为苍生事死何惧》因不宜深入而被移动帖子。”山西疫苗的问题居然“不宜深入”，我相信这不是老沐的意思，但会是谁的意思呢？这个问题不宜深入，现在还有什么“适宜深入”的呢？

2010年3月31日于保定

这些天，许多朋友或打来电话、或发来邮件、或网络留言问候我，大家都在深深地担心着我的安危。有朋友还特别提醒我：“山西那边的人特黑，外出一定要小心，特别是晚上，别让他们把你给黑了。”

3月24日，山西警察进京来“接”陪兄看病的死亡患儿家长王明亮，当大家知道我与他在一起时，许多人担心我也会被习惯进京抓记者的山西警察一并抓走。

更多的朋友认为，目前山西当局及卫生部不断表达的“负责任的谎言”，才是最为令人恐惧的。

这些天，与我接触过的患儿家长们几乎都被当地相关部门从太原带回村庄，被“关照”了起来。另一方面，相关部门的调查仅限于我报道中提名的15户患儿家庭，几位患儿家长打来电话说，山西日报报道称，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我所报道的患儿的情况与实际严重不符。

山西省疾控中心干部、疫苗事件举报人陈涛安昨天在电话里告诉我：“其实这几年，在山西至少有500多个家庭向省卫生厅申诉过疫苗伤害问题，我们所掌握的名单，他们应该都有的。如果他们是对孩子们的生命负责，现在需要做的是对山西所有接种过高温疫苗的孩子进行全面普查！而不是给媒体找茬，楞要在鸡蛋里头挑骨头！这绝对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对官员个人的利益负责！”

昨晚，我的同事在山西太原见到了山西疫苗事件的核心当事人，刚刚旅游回国的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主任栗文元。栗没有受到任何部门的“约束”，很自由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的同事。栗将自己身上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甚至连由他负责操作近两年的标签疫苗也称不知情。

一位从政几十年的老朋友告诉我说：“水太深了！你得有所准备，要做最坏的打算。”

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每天都在关注着这一事件的进展。昨晚，他鼓励我：“你这是为天下苍生的生命安全呼喊与奔走，没什么可怕的！”

这几天，我的总编辑包月阳、副总编辑车海刚不断讲：“为了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我们将战斗到底！”

这让我想起，几天前一位在青海省工作的中学同学华三春对我讲的一句话：为苍生事，死何足惜！

公民签名呼吁公开公正调查山西疫苗重大事件

三聚氰胺毒奶粉所带来的遗害未了，山西省上百儿童因注射疫苗后出现或死或残，或留下严重后遗症的重大社会卫生事件又被举报揭露于媒体。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商勾结，与“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手垄断山西省的疫苗供应，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以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使大量疫苗因高温暴露而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儿童健康及生命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重大事件。鉴于此严重事件被披露后山西省政府及属下卫生厅极力掩盖事实的做法及态度，又鉴于作为我国政府喉舌的新华社积极配合山西省政府压制真相暴露的行为已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作为共和国公民，我们在此签名，高声疾呼：

一、中央政府或全国人大应当迅速成立山西疫苗事件真相调查组，尽快给愤怒的全国人民一个公正的山西省疫苗事件的真相调查报告。

二、在更多媒体进入山西省调查的同时，任何党派的宣传机构或政府的宣传机构均不得对调查真相的媒体或记者予以打压。

三、山西省卫生厅及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此次责任事故的嫌疑主体，是应当受调查的对象，不得自我裁决以解脱责任，司法机关对其涉案的主要领导者应当尽早立案予以调查。

四、支持王克勤先生“呼吁更高层次、更有公信力、更加权威的卫生鉴定机构，尽快进入山西，做出科学、公允、独立的调查结果”，提议邀请联合国卫生组织派出调查组进行独立调查。

五、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应当支持公益律师为疫苗事故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使受害者的权利得到合法的维护。

六、政府应当保障疫苗事件的关键举报人陈涛安先生以及披露记者王克勤先生的人身安全及人身自由。对受害者家属的人身安全与自由也应同样予以保障。我们也呼吁公民对这些事件的举报披露者展开公民保护行动，以防止政府可能不作为造成的后果。

七、允许民间爱心团体及救助机构或公民自由援助受害者及其家庭。

八、请全国关注此事件的公民，对山西省党政领导层的为民执政能力展开评议。凡对人民利益及生命健康不负责任的领导，提请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予以罢免。

以上八条，是我们对山西省疫苗事件的初步态度。我们呼吁更多的公民，加入关注此事件的行动行列，提出更多的有效建议，以推动对事件的真相调查，以及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签名邮箱：mwb8980@gmail.com

2010年3月27日 签名名单略

（源于：维权网）

【宪章动态】

日内瓦人权、宽容和民主高峰会开幕，杨建利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零八宪章》

【参与网 2010 年 3 月 10 日讯】：由“非政府组织联盟”主办的第二届日内瓦人权、宽容和民主高峰会于 3 月 8 日上午 9 点在日内瓦国际会议厅开幕。非政府组织联盟由 25 个世界各地非政府组织组成，自去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高峰会，就人权领域的高峰议题进行讨论、通过决议并形成联合行动。哈维尔先生和瓦文萨先生是日内瓦高峰会的共同主席。

非政府组织联盟的执行理事 John Suarez 主持了本届会议的开幕式，日内瓦市市长致欢迎词。

出席本次高峰会的《零八宪章》签署人、公民力量发起人、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杨建利博士在走进会议厅前接受了数家媒体的采访，并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杨建利表示，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表现在各个方面，民众的不满逐日加深，抗议越来越公开，规模越来越大，采取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就国际人权组织的资源和运作状况，全面介入是不可能的，最有效和最有整体意义的支持是帮助中国的民间领袖创造更大的自由空间，刘晓波是中国民间领袖的代表人物。中国各地区各阶层的民间领袖是将普遍存在的抗议转化为持续的民主运动的关键，因此是中国民主变革的关键力量。但是中国国内的民间领袖受到多种形式迫害，如关进监狱里、被软禁、跟踪、骚扰等，很难有正常的生活。很显然，狱中的越少，狱外的民间领袖空间越大，中国民主运动的形势就越好。杨建利强调，帮助这些人应该成为国际人权组织的重点。

杨建利向与会者介绍了《零八宪章》的重要意义，他说，《零八宪章》从中国各阶层呼唤出一大批民间领袖，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将发挥准组织化的功能，《零八宪章》为割裂的中国提供了创造符合普世价值的共同政治语言进而形成未来民主中国共识的新的起点。随着共识的增强，民间民主力量逐渐成长，以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为粘合剂形成的权贵集团终将瓦解。杨建利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零八宪章》予以支持。

杨建利在演讲中特别介绍了互联网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的符合普世价值的公共政治语言会首先在网上形成，未来民主中国的共识也会首先在网上形成，一定程度的民主生活会首先在网上实现，这对在实际世界中实现民主中国至关重要。对民主运动来讲，互联网是不可缺少的组织动员工具。网络自由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专制国家的民众的共识。因此，杨建利提议，世界各民主政府，非政府组织，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携手推动联合国颁布世界网络自由宣言，并以人权公约的形式敦促其成员国签署。据悉，高峰会的闭幕式上将通过日内瓦网络自由宣言，杨建利参与了这个宣言的起草工作，并与一位伊朗的民主人士一起担任这个重要宣言的共同主席。

杨建利的演讲受到热烈回应，当被问到如何具体帮助中国的民间领袖时，杨建利提出一些建议，其中之一是鼓励人权组织和个人有针对性地帮助中国民间领袖，比如，某一人权或民主组织认可谭作人，那么它就可以集中资源、长期地帮助谭作人发声，帮助其家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等。为了避免资源在某些人身上重复使用，可以考虑协调行动。总之，扩大民间领袖的空间，降低

他们和家人的成本代价风险，那么就会有更多人涌现出来从事民主运动，把民主运动从英雄的运动变成普通人的运动，我们就有机会成功了。

由于要在3月9日赶到印度达兰萨拉参加流亡藏人3.10的纪念活动，杨建利在本次高峰会上发表演讲后，已搭机飞往印度。

【宪章论坛】

高扬《宪章》大旗，开展“立体维权”

——写给十字路口上的《零八宪章》

赵常青

《零八宪章》颁布至今已过去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就《零八宪章》的生命状态而言可以用十二个字来加以概括和总结，那就是：凯歌行进；黑云压城；暗流汹涌。

说“凯歌行进”，是因为《零八宪章》一经颁布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外形成了一个《宪章》共识运动——在《宪章》公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有前后十批共计7578名中国公民实名联署以表示对《宪章》的认同和支持，此后又有数千中国公民联署其上。不仅如此，《宪章》及其主要发起人还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多项重大荣誉，如2009年3月11日，303名《宪章》首批签署人获得捷克前总统哈维尔颁发的Homo Homini人权奖；2009年10月29日，设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宣布将2009年度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授予《零八宪章》所有签署人。此外，《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还先后获得2009年度的“自由写作奖”和“自由精神奖”。2009年底，刘晓波还获得了国际知名人士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提名——由此可见，《零八宪章》确实经历了一段凯歌行进的日子。

说“黑云压城”是因为《零八宪章》一经诞生便受到来自党国机器的围攻打压，不仅对《零八宪章》采取信息封锁和信息过滤，而且对《宪章》签署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问讯和传唤，对《宪章》的灵魂人物张祖桦先生进行全年全天候的监控。09年6月23日则对《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给予正式逮捕，同年12月25日，党国政治裁判所则以所谓“煽颠”的名义判处刘晓波11年有期徒刑。除此之外还对赵达功等人进行了传唤拘押，一时间风声鹤唳，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说“暗流汹涌”，是因为《零八宪章》一经亮相便在国内外的民主维权阵线里引起部分同志的异议甚至怪议。有论者认为《宪章》只不过是众多的签名文件之一，了无新意；有论者认为《宪章》只不过是一次“集体谏言”活动；还有论者认为《宪章》是“跪着造反”。在刘晓波被逮捕

判刑后，批评人士更是群体亮相，集体声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认为刘晓波被判刑，《零八宪章》所宣示的“谏言”道路已走不通，和平改良已彻底破产！

应该说，体制内的“压城黑云”和体制外的“汹涌暗流”对《零八宪章》形成了一种颇为默契的两面夹击之势，当然这只是“巧合”，而不会有别的什么弯弯环环。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力量对《零八宪章》都构成了一种不小的杀伤力，在此情况下，《零八宪章》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上的选择，是激流勇进呢还是偃旗息鼓，国内外不同人群都在拭目以待。

（上篇）2010 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及其战略走向

要解决《零八宪章》的未来走向问题，我们就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必须对 2010 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及其宏观走向做些战略分析。

2010 年是整个 2010 年代的头一年，要看 2010 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就必须先来看一下 2010 年的中国政治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按照对待“民主”价值观的基本态度来划分，目前大陆的各色政治力量大体可以划分为“民主阵营”和反民主的“保守阵营”。

“民主阵营”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板块。

体制外的民主力量大体由以下八个纵队构成：

- 1、《零八宪章》
- 2、家庭教会
- 3、法轮功
- 4、草根维权
- 5、法律人
- 6、多数 NGO
- 7、部分中产阶级经济人
- 8、自由主义知识界

这些体制外的民主力量虽然互有交叉，但横向划分，大体可以划分为这八大板块，各个板块也有不同于其它板块的一些特色。如基督徒家庭教会正在从隐形民主力量转向显性民主力量，许多基督徒法律人已经积极参与到民间维权当中。虽然在 2009 年底到 2010 年初，北京、上海、山西、新疆等地的家庭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和打压，但由于家庭教会人士的依法抗争，党国机器也只好且战且退。可以肯定的说，在 2010 年代，家庭教会将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强大生力军。

法轮功作为受党国机器迫害最为严重的国内群体，目前依然在受着打压（如笔者前不久路过北京温泉村时便看到有一面横幅上写着“积极检举揭发法轮功分子”），他们也是截止目前为止被党国机器推得最远、最为边缘的人群，可以想象在 2010 年代法轮功人群会是中国民主事业至为坚定的支撑力量。

草根维权力量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民主事业最为强大的后备力量。从目前情况看，草根维权已遍及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甚至出现了部分公检法司人员因为拆迁也公开站出来维权。但是这些草根维权中的绝大部分目前还处在具体的“利益”抗争阶段，绝大部分维权者还停留在“就事论事”阶段，还没有看到侵权事件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党国体制的问题，还没有意识到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是伤害自己的最大元凶。因此，草根维权阶层需要民主精英阶层的加速培训和引导，使之在2010年代的民主转型中能够从本能的“条件反射”群体上升为自觉的“非条件反射”的民主大军——能否促成草根维权群体的这种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未来的民主转型是走向失败还是走向成功。

在高层知识界，敢于像堂吉诃德那样公开跳出来叫阵共产主义“风车”的“士”们是越来越多了。在2010年代，这种趋势只会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而不是相反。很自然这些学界人士不仅在积极构建中国民主转型的软文化，也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打出体制擦边球，甚或直接赤膊上阵，共吹民主冲锋号。

法律人（学者、律师）作为法治社会的理性建构者，不仅诸多人士在努力建构民主法治的软文化，而且通过具体维权事件的直接参与，正在积极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自孙志刚事件以来，诸多维权事件中的法律人士正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毫无疑问，这些有着良好学术训练和维权操作实践的法律人会成为未来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精英。

其他如各种NGO、部分新兴企业家、经济人也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加盟力量。前不久发生的一个突出事件是有将近6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平安公司中层精英云集平安总部高喊“维权”。

以上是“体制外”八大民主力量的简要分析（宪章派后文分析）。

“体制内”的民主维权力量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三块：

首先，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开明派，在党国高层以温家宝为代表。这一派总体上说在各层级的官僚系统中仍然处于少数地位，在政治局里，目前几乎只有温总一个人在孤独的“仰望星空”。但温总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虽然遭遇顽固派们一年多时间的讨伐（普世价值），但在今年两会前的网上活动中，依然深情大喊“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并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公平”、“正义”与“尊严”的问题，要求各方面“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在“封疆大吏”中，湖南“省督”张春贤人也不错，在去年他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是“还利于民”，第三次思想解放则是要“还权于民”，今年两会又比湖北那个抢麦克风的“省督”要好得多，认为“湖南不忌讳监督，希望大家监督”，并愿意“带头公布财产”。当然在党国体制内，这样的高官显宦并不多。

虽然在执政党的官僚系统里向“民主”看齐的人并不多，但在他的智囊机构，在“共”姓学者群里，鼓呼民主和普世价值的却也不在少数。而绝大部分的基层共产党员由于所瓜分利益不多或很少，也会对现存体制中的“马太效应”甚为不满，也有一种强烈变革的欲望。这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内存在着相当一批民主改革力量，而且这些党内民主力量从毛太祖时代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如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等，甚至邓小平也算得个半吊子民主派），如果温家宝能够在未来三年奇迹般地改变高层力量对比（可能性当然很小）甚至不惜登

高一呼，那么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将会大大地节约各样成本和消耗。因此，中共党内民主改革力量是必须争取和保护，而不是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批评和谴责！

其次，是媒体与互联网。在现行体制下，所有媒体都还在党国控制之中，但是媒体倾向自由的先天属性决定了在2010年代的民主转型中，媒体与互联网会成为民主与自由的锣鼓与号角。其实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报系对中国民主自由软文化的贡献居功甚伟。互联网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两会召开前，竟有国内十三家平面媒体联合刊发“共同社论”要求两会关注“苦民久矣”的户籍制度，这是89年以来数十年间未曾有过的新鲜事，虽然社论作者和相当多的编辑被党国“真理部”所处理，但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气，正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媒体人士站出来说良心话、做良心事！

第三，是接受过89民主洗礼的89一代人。这里主要不是指89学生领袖群体（这个群体一直在做民主努力），而是指89之后分批进入主流社会并在各行各业中勤奋工作的85级、86级、87级、88级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群体，这些人可以称之为“89集团军”或“89兵团”。这个群体出生于60年代，成长于80年代，他们不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大讨论”中接受了“欧风美雨”的心灵滋润和渗透，而且也整体接受了89民主运动的“成人礼”。80年代的民主启蒙与街头化的民主操作实践历程成为这一群体最为壮丽、最为难忘的青春记忆！这一群体作为80年代的青年精英现在正处于45岁左右的年龄段，这一年龄段的人无论在哪个领域现在都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担纲人员，都已进入富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社会中坚阶层。既就是有少部分人彻底告别“89”，完全跪拜在党国体制下沦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绊脚石”，但我想其中的绝大部分人还是会为自己当年的“街头化”剪影而骄傲和自豪的，还是会在关键时刻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有力推手的。从绝对数量上讲，这个人群大概在300万左右，但就其能够影响的人群而言大概不下一亿。在2010年代中期，这个群体大致进入50岁上下的年龄，正是掌控社会中下层资源的黄金时段，如果“89兵团”的整体记忆在最近几年被迅速唤醒并浮出水面的话……主啊，那将会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一个多么大的祝福——重要的是，这份祝福是必然存在的、一定存在的！

分析完了国内民主阵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保守阵线的生态构成。

反民主的保守阵线大体分为两块：

一块是体制内的党国中左联盟，这股保守力量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官僚贵族集团和财富暴发户集团，官僚集团和暴富集团通过权钱交易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利益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器，还基本垄断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优质资源。从表面上看，这个利益联盟还非常强大，但由于中国社会现存的一切假丑恶现象几乎都来自于这个利益集团的无限制“作案”，因而执掌政权的中左联盟正在大大的丧失一个政权所必须的道义基础和人心基础。本来2003年我初入狱时对胡温政权还非常看好，不仅对温总充满了期待，对胡总也充满了同样的期待。但非常遗憾的是胡总只是当大官的命，而不是做大事的命。胡只热心于做官、做大官、做最大的官，心中根本没有改革计划和改革蓝图，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如果说胡在奥运会前的2006年和2007年与温合作还表现出了一点民主改革意向的话，奥运结束后，则明显撇开了温总而回归党国中左联盟的怀抱，其标志性的举动便是2008年12月18日在党国纪念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在讲话里非常有针对性地讲了一句“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把民主化道路说成是“邪路”，不知跌落了多少当今

世界高贵的眼镜……，这是闲话，问题在于胡总去日无多，在离任前的两三年内指望胡总修正自己的“邪路”论，恐怕有些不太现实。中间偏左的胡锦涛现在所能做的恐怕也只能是竭尽所能地维护党国已经有些苟延残喘的维稳体制了。

但是如果不有效地进行民主化改革，现存的一切严重问题都不会得到很好解决，如腐败问题、社会失公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维权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问题乃至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海两岸的统一问题，统统都难以解决。甚至会越来越恶化。尤其重要的是党国所赖以生存的“GDP”合法性问题会因为政改滞后而引发更深层的经济危机。在未来两三年内，如果三十年累加起来的所谓“GDP”合法性也因经济危机而消耗殆尽的话（如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那么可以肯定的说 2010 年代的民主转型将会大大的加快，因为党国维稳体制不仅丧失了道义基础，而且连所谓的“政绩合法性”也难以看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总抗拒改革可能会加速党国体制的最后崩盘。

反民主的保守阵线的第二个板块是所谓体制外的“极左毛派”。严格的说，极左毛派不仅存在于体制外，也存在于体制内，不仅在野，而且在朝。在野的以“乌有之乡”及新成立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国工人党”为代表，在朝的则以“唱红黑打”的“薄书记”为代表。客观地说，毛左派们也看到了三十年改革进程所产生的诸多社会弊病，如腐败、社会失公、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等等，但他们不是向前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中寻找解决病苦的良方，而是反身向后试图从毛泽东主义的阴魂里寻找救世道路。这当然犯了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错误。但是这股极左力量决不可小视，尤其是他们奉行的民粹主义路线可能会蛊惑相当一批底层民众，而且他们在 2008 年 12 月 26 日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中不仅把中共执政集团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并一口气喊出十四个“造反有理！”（坦率的说我认为其中的大部分“造反”理由确实是“有理”的），而且公开宣称“《零八宪章》反动精英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中国的民主转型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毛左派们恐怕会成为下一个传统帝国的制造者！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但这种恶果是必须避免的。当然也不可将拥抱民粹主义的极左派们的力量过分夸大，在目前，他们中的在野力量还大多停留在用舌头进行“造反”的阶段，在朝的“薄书记”虽然在“唱红黑打”中赢得了一定的民众支持，但其汹汹势头则由于各种原因而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幸乎哉！

这便是我所见到的 2010 年中国政治生态的大致构成。如果不是天神格外恩典这个民族的话，大概在 2010 年代的初期还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民主阵营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勃勃英姿逼向威权体制的“紫禁城”。相反，反民主的保守阵营尤其是党国体制内的中左权贵联盟面对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运动却常常是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大有力不从心、日暮途穷之象。也正因此，中国的民主转型不会如有些同志所说的那样，还要等待三、四十年——不会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同志们！关键转型期就在 2010 年代的中期，多则六七年、少则三五年必将迎来两大阵营的“圆桌会议”时期，这不仅是天命所归，也是根据本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和演变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下篇）“合纵抗秦”、吹响“立体维权”冲锋号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在我们弄清了 2010 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和民主转型的战略机遇后，我们就必须进行战略布局，

抢占先机，开始一个积极的“英雄创造时势”的战略运筹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合纵抗秦”，其中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合纵”，是民主阵营内部各大板块之间的默契“合纵”，组建民主阵营的权威平台，再由这个权威平台对全国范围的“抗秦”大业做统一部署和安排。

那么，该由谁来主导这个战略平台的构建，看似一个很叫人头痛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政治权威实际上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谁的力量大、实力强，并有不可遏止的政治抱负和雄心，谁就可以主动来挑这个头、担这个纲。而从目前体制外民主阵营的八大板块（《零八宪章》、家庭教会、法轮功、草根维权、自由主义知识界、法律人、多数 NGO、部分中产阶级经济人）的力量对比而言，《零八宪章》与家庭教会显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零八宪章》独占翘楚、具有最好的战略平台。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因为其他七大板块还处在一个相对弱小的阶段，如基督徒家庭教会从总体上讲还处在一个自我维权的阶段，尽管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学者、法律人有为中国民主事业鞠躬尽瘁的雄心壮志，但就目前的家庭教会而言，绝大部分还将政治关在门外，绝大部分信徒还只是从信仰本身来要求自己的；法轮功因为党国的严厉打压而严重被边缘化、地下化，几乎很难有比较大的地面作为；草根维权、众多 NGO 也还没有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法律人、自由主义学者大多还处在良知驱动的“个体户”阶段，中产阶级经济人就更少了。但《零八宪章》就不一样了，与其它几个板块相比较它有以下三点特别的优势：

第一，《零八宪章》卜一出世，便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主义”和“旗子”，这便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一开始便向世人彰显了自己的“政治雄心”，不屑于拐弯抹角、遮遮掩掩，并公开的提出了包括“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在内的十九条主张，从而一开始便占领了政治制高点。

第二，《零八宪章》一经诞生便在国内和国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文本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是勿容置辩的事实。

第三，尽管《零八宪章》也曾遭到党国打压，文本主笔之一刘晓波还遭到重刑处理，但除刘之外，一万多联署人的有生力量基本完全保存，这是《零八宪章》开展下一阶段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好人力储备，其他任何现存板块都不具备这样的人才库存。

由于这三点其他板块目前还不具备的政治优势，所以由《零八宪章》出面来承担“合纵长”的庄严使命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理想的选项。

但是，《零八宪章》却存在着一种非常虚弱和危险的苗头，那就是将《宪章》“文本化”的倾向。著名民主人士胡石根先生曾说“《零八宪章》绝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但是《宪章》公布后似乎给外界留下了只是一个静态的政治文本的印象，而很难让人得出一个动态的“宪章运动”的结论。这一年多时间以来，《宪章》做得最好最多的事情便是滚动签名、网络宣传及相关理论建设，但实践层面的维权活动却几乎没有太多作为，这不仅是一个严重失误，也是《宪章》被一些同志诟病为“谏言书”的根本原因。

这种局面必须尽快扭转，“文本化”的不良势头必须尽快得到遏制，“宪章人”必须集体行动起来！

结合 2010 年的政治生态及其战略演变趋势，我认为《零八宪章》应该迅速着手一下两项工作：

第一，《宪章》决策圈与智库的概念化。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宪章人”是走和平改良路线的，《宪章》必须进行概念化的决策圈建设。如果只把《宪章》当做一个文本，《宪章》的历史使命当然已经完成，但是无论《宪章》发起人还是联署人都不期望是这样一个结果，因此，宪章人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布局。而要进行战略布局，就必须有一个概念化的决策团队，这是任何政治运作都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虽然概念明晰化的决策团队有遭遇党国机器打压的风险，但要把《零八宪章》做大、做开、做强就不能指望万无一失，而政治家的魄力正是在“运动”中产生的，是在不断前进的“运动”中产生强势影响力和召唤力的。按照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追随者不仅要能够“看得见”富有政治智慧的领袖，还要看得见一个强大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领袖团队，唯如此，宪章运动才会召唤更多的人心，才会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

第二，迅速开展“立体维权”。

就“维权”和“民运”的关系而言，可以说当年的“民运”（“民主运动”的简称）就是现在的“维权”，因为自 79 “民主墙”到 98 组党的二十年，可以说一切民运人士所要维护的权利不外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是在维护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它当然是一种“维权”活动了，可以称之为“早期维权”，它偏重于政治维权或者说偏重于从“上层建筑”角度进行“维权”。而本世纪初兴起的草根维权则偏重于一时一事的具體利益抗争，偏重于从“经济基础”角度来维护自己受到损害的权利。虽然现时期的草根维权还没有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但底层民众在维权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进一步觉醒，这种觉醒的最终归宿必然是公民“政治权利”的觉醒。因此现在的草根维权可以看作是中国民主运动（简称“民运”）在新时期的一个“变异”，这种“变异”不是对传统“民运”的否定，而是一种新的继承和发展，如果加以有效引导和提升，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民间维权必然迅速上升到政治权利的有效抗争。

因此，《宪章》领袖及其核心决策平台必须迅速果断开展新时期的新兴维权运动，用我的话说就是掀起一场持久的“立体维权”运动，这是《零八宪章》从“静态”走向“动态”，从“无为”走向“有为”的最佳路径，是可以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的不二选择。

那么，什么是“立体维权”呢？

所谓“立体维权”就是既要继承早期“民运”偏重于从“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维权活动（宪法 35 条），更要重视草根维权偏重于“经济基础”方面的维权活动，既要重视和维护宪法保障的公民政治权利，也要重视和维护同样是受宪法保障的属于广大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与宗教权利。它是“上”和“下”、“宏观”和“微观”相互照应、相互影响又相互提升的维权活动，是点、线、面、体四管其下的维权活动（注意不是点、线、面、体的依次推进，而是四管其下、并驾齐驱），这种“立体维权”的终极目标便是《零八宪章》早已昭告天下的“民主、自由、宪政”国家的诞生！

具体地说，宪章人又该怎样开展“立体维权”呢？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以《零八宪章》联署人为基础，组织大量的法律人系统和学者系统。法律人分为学者智库平台和律师维权平台。学者团队立即着手《零八宪章》所宣示的十九条“基本主张”中能够进行现实操作的内容，偏重于理论、法理和学术建构。比如说十九条“基本主张”中的第一条就是“修改宪法”，那么宪章人就不能坐地等待党国的修改，而是我们自己可以组织一个“修宪小组”，具体讨论现行宪法中有哪些“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需要添加什么内容？要拿出我们自己的具体意见和方案来。又如十九条“基本主张”的第四条有“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内容，我们的学者也可以组织一个民间“违宪审查小组”，专门对党国的一切重大党政行为进行相关“宪法”审查，如对劳教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审查等等，并及时公布于社会大众，引导舆论形成对“恶法”进行修改和废除的强烈民意呼声。其它“主张”以此类推，均有现实操作空间，这是学者团队要做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律师团队。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律师介入民间维权活动，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律师介入的人数和规模远远不够。因此《宪章》核心决策层必须努力重视自身的律师人队伍建设，使得每一个发生重大维权事件的现场都会有《宪章》法律人的存在，切切实实的参与到民间维权案例中，让草根阶级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宪章人”的身边存在，并通过媒体和互联网宣传放大这种存在，从而增加《宪章》和“宪章人”的凝聚力和召唤力。

很显然参与底层民众“打土豪，分田地”的维权活动仅有律师人队伍是不够的，还应该动员大量的社会志愿者，使这些志愿者也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尽可能的参与各地维权事件，这样《零八宪章》及其领袖群就会在草根阶层拥有更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并且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广大民众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就会越来越高。

当然，“宪章人”在积极参与民间维权事件的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培养和引导各地维权精英的民主法治理念，使他们能够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地方官府侵犯民权的政治制度背景，从而引领他们成为民主转型时期能够号令一方的各地政治精英。

《零八宪章》在十九条主张里还具体谈到“公职选举”问题，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会进行换届选举——是否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就动员培训有条件的“宪章人”直接参与地方选举，也是《宪章》决策圈需要重点考虑的事项之一，以笔者98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陕西地方人大代表竞选的经验，我认为这块天地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是能够做出大部头的精品文章的。

总之，刘晓波被重判大刑后，《零八宪章》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对2010年的中国政治生态，《零八宪章》作为国内民主阵线的最好政治平台，“宪章人”应该自珍自爱、奋破困局，奏响“立体维权”的动员号角，广泛深入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底层维权，张扬《零八宪章》作为民主大旗的凝聚力和召唤力，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内民主阵营的“合纵”建构，那么在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大变局中，“宪章人”必将领袖群伦，尽享风骚，《零八宪章》不仅会因此成为亿万同胞理念上的福音，而且会成为上帝对中华大地的现实祝福！

2010年3月25日

从上书请愿到街头运动：立宪党人的时代抉择

黎建军

光绪 33 年 5 月 28 日，清廷下达《立宪应如何预备施行准各条举以闻谕》，准许各界人士对如何立宪畅所欲言，并可对所写方案由相关衙门转呈皇帝。这道上谕中有这样的内容：自今以后，应如何切实预备，乃不徒托空言，宜如何逐渐施行，乃能确有成效，亟宜博访周諮，集思广益，凡有实知所以预备之方施行之序者，准各条举以闻……只要切合时势，实在可行者，逐一具陈，以便省览而资采择。（《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44 页）

这道上谕下发后，清末的立宪运动得以切实开展起来，民间和朝廷对如何进行宪政，有了可以互相沟通的渠道。从 1907 年起，中国立宪党人的活动转为以上书表达自己对宪政改良的看法为主。而随着立宪改革的深入，清王朝的改良步伐与中国民间对实行宪政的要求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形成了民间从最初的联名上书至后来的联名请愿，最后演变为行为相对激烈的街头运动。

这一时期立宪党人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 1907 年至 1909 年为第一阶段，以上书请愿为主，1910 年及以后为第二阶段，以街头运动为主。

为了把关乎未来国运的立宪运动带入民间设计的轨道之中，在光绪的上谕发布后，立宪党人纷纷联名上书，都想把自己对如何进行宪政的想法及时上达皇帝。光绪 33 年 8 月 28 日，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法部主事沈钧儒，宗室恒钧，附生雷光宇等人代表留学海外人员上《请速设民选议院呈》给朝廷，为民间上书要求清廷施行宪政的开端。在这篇呈文中，他们对开设民选议院以造成国家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作了精彩论述：国家成立，端赖法律以维持，世界之列强，均有一成之法典。中国疆域辽远，风俗各殊，朝廷既无一定之法文，民间又无共通之习惯，纷杂混乱，为世界所仅有，非使立法机关及早成立，必不能保国家之画一，而促社会之进步。目不仅此也，数载以来，内患频兴，讹言四起，官吏日以防乱为事，人民日以避祸为忧，恐慌纷扰，势将激成大乱。唯有召集民选议院，使制定民刑各法，以为司法独立之地步，则人民之生命财产有所保护，社会之安全秩序或可维持。夫而后民情乃可以即时静镇，法权亦可以设法收回，此尤国家莫大之幸也。夫三权分立，为各国通行之制度，即为将来立宪之本原。今行政各部方始更革，若开设国会以为立法机关，则司法旋可完全独立，是亦预备立宪之缓急先后也。（《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 613 页）

在这篇呈文中，还对借口民众素质不高，不适宜开设民选议院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即令开设民选议院，亦无实效。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夫人民程度有自然发达者，有助长而使之增高者。东西各立宪国，唯英吉利之国会，由人民程度之自然发达而来，除此以外，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特因有国会以助长之，乃得至于今日耳。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此有国会之故，训练既熟，经验既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之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设以为今日之人民程度有所未逮，故不开国会，然迟之十年数十年，人民以无参政机关助长其发达之故，则其程度仍无以异于今日，不几永无可以开设国会之期乎。

后来，湖南举人肖鹤祥，北京谏议局议员孙洪伊等都曾呈文。在立宪党人的所有上书中，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请求朝廷在一、二年之内速开国会。但清王朝立宪的步伐却远远赶不上民间的呼声，以至于联名上书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出现进入北京上书请愿的现象。

清廷预备立宪诏书下达后，除了开始有大量的上书外，另一个后果就是各地立宪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当时各地的立宪团体有江浙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这些立宪团体中以江浙的预备立宪公会的号召力最大。1908年6月，预备立宪公会由郑孝胥领衔联名向清廷请愿速开国会，并致函湖北、广东等省立宪团体，约定7月各派代表赴京请愿。因为正赶上8月份宣布宪法大纲，议院组织法及选举法，并确立筹备立宪期间为9年，所以这次请愿行动并未遭到清廷的干涉，但清廷9年的筹备期限让请愿者大失所望。

1909年9月，各省谏议局成立。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些谏议局的议员们正好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谏议局成立后，把召开国会当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议员们一当选就立即展开请愿活动。在江苏谏议局的倡议下，1909年10月，16省代表51人齐集上海，举行各省谏议局联合会议。在中国近代史，江苏的立宪党人为中国的宪政事业和中华民国的诞生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其一是清末为立宪运动团结联合了各省谏议局，使这个新物种一降生就爆发出令人生畏的能量，二是辛亥革命后不久即发起组织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此基础上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09年10月的上海会议上，代表们决定发动各省谏议局议员签名请愿，同时决定各省谏议局各派3人于当年12月集于北京，向清王朝递请愿书。当请愿代表们来到北京，并受到北京各界集会欢迎时，市民们也蜂涌而至，纷纷要求代表们继续请愿，不达目的，宁死不返。全国舆论也对请愿行动给予热烈支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众从来不缺乏热情，也从不缺乏觉悟，素质低下更是无从谈起。但面对请愿民众断指、割臂的决心，神经麻木的清王朝依惯性思维拒绝了代表们速开国会的请求。

不死心的代表们在北京跟清廷彻底杠上了。他们组织起“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继续策划第二波的请愿行动。为了扩大声势，他们决定联合各团体代表进行请愿，尤其积极策动商界人士加入。在他们写给各省商会的信函中，特别强调立宪和商人有密切的关系，指出如果国家政治能够整顿，商人将受到保护之利，否则深受其害，难以立足商业竞争的世界。信函中有这样的内容：今日世界，无不以工商业为立国之根本者。夫商人既一跃而居国中最重要的地位，则国中政治之得失，自与商人有特别利害之关系，故吾国今日国会请愿之事，尤应以联络商界为中坚。（《国会请愿代表团敬告各省商会书》《申报》1910.4.27）

这次扩大请愿阵容的倡议，得到各界的热烈支持，各省商会纷纷派代表加入请愿代表团，如上海商务总会就选派了信成银行协理沈缙云为代表。当沈缙云和其他江苏省请愿代表连袂北上时，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江苏谏议局研究会、华商联合会、国会请愿同志会等15个团体在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开欢送会，场面极为盛大。

1910年2月，国会请愿同志会成立，即派代表赴各地游说鼓吹。3月下旬，各省分会也先后成立。5月，各省代表陆续抵达北京。此时，代表的阵容和代表的阶层已远远大于第一次请愿。有谏议局代表，政团代表，商会代表，教育会代表，海外华侨代表，还有旗籍绅民代表等10个阶层。但请愿的结果，仍然是清王朝的拒绝。商会代表沈缙云在得到请愿遭拒的结果后，曾发出绝望的感叹：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沈缙云先生年谱》）这也显示

他已经决定不再为清廷的命运作任何的努力了。

1910年9月后，愤怒的立宪党人已不再是派代表上书请愿，而是变成全国规模的街头运动了。

在北京，由孙洪伊领头，他们同时向政府，摄政王，资政院和都察院上书，并要求会唔摄政王面陈一切。而清政府各机关除资政院外，一律拒绝受理请愿书。请愿民众便在衙门外守候，警察驱不散，大员劝不走，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与此同时，各省谘议局，政团，社团发动民众包围督抚，要求他们代奏请愿主张，轰轰烈烈的为争取宪政民主的街头运动在全国展开。

10月5日，直隶各界在天津举行请愿大会，会后2000多人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要求总督陈夔龙代奏请愿书，开始陈夔龙拒绝，民众就整天包围署衙，让陈夔龙动弹不得，到了晚上，他不得不承诺连夜撰稿代奏，请愿民众方才散去。

10月16日，开封民众3000余人开请愿大会，要求巡抚宝霖代奏请愿书，后又至谘议局，提出：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

10月19日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速开国会，10月29日，3000人集会，通过请愿书，请总督赵尔巽代奏。

10月23日，陕西召开万人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衙请愿。

10月30日，福建九府二州各界代表4000人在省城开会，呼吁一年以内即开国会，要求总督松寿什代奏请愿书。

同日，四川6000余人参加大会，要求明年即开国会。

由于此次运动为全国同时发起，加上各地报纸竭力声援，使全国都卷入这场政治浪潮之中，并使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阶层都受到立宪运动的强烈震撼。

在这次的街头运动中，立宪党人意志坚决，气势悲壮。运动领袖孙洪伊说：抵死请愿，无论如何危险皆所不计。

面对全国的街头运动浪潮，清廷也不敢顽固下去了，10月3日，下诏缩短筹备立宪期限，由原定在1917年开设国会，改在宣统5年（1913年）。这是满清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民意妥协，但清王朝的让步却使民众及立宪党人大失所望。

在清廷下诏缩短筹备立宪期限后的11月6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奏奉省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折》，在这道奏章中，锡良奏道：本月初三、初五等日，有各界绅民万余人，手执请开国会旗帜，伏泣于公署之前，求为代奏。先经各司道婉加劝慰，仍不肯散……当据代表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面递公呈，大意则以东省大势较三次上书时日俄协约，日韩合邦情形，更有迫不容待者……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

最后锡良说道：总之，时危势迫，为民人之大患，亦朝廷所深恫，何必靳此区区二年之时间，不与万姓更始耶？

而清廷在这份关乎国土存亡的奏折中却留下了这样的朱批：缩改开设议院年限，前经廷议详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 648、649 页）

这时的清王朝，已呈将死之状，除了那可怜的皇位，它已什么都顾不得了。

梁启超在轰轰烈烈的街头运动遭清王朝拒绝后，曾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文字：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唯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剝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讖矣。（《合集·文集》之二十九 第3页）

在10月3日清王朝上谕公布之后的当天下午，国会请愿代表团的成员就集合在国民公报社，密商以后的行动。据主持国民公报的徐佛苏记述，曾有如下决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

到了此时，清王朝在全国民众眼里，已是信用全无，腐朽透顶，人人欲先除之而后快的落日政权。

1911年4月，铁路国有风潮发生，5月下旬，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因请愿被押解回籍时，留在京中的各省代表前去为他送行。蒲殿俊跟他们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显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四川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而前面提到过的上海银行家著名立宪派人物沈缙云，则干脆加入了同盟会，走上了暴力推翻清王朝的极端道路。

2010年3月25日

（源于：民主中国）

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 10 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 365 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 13 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找寻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 30 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 and 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

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

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東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 2002 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軾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 100 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 30 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 30 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 2005 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

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 30 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 3 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 17 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 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 80 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2010 年 03 月 20 日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吴高兴

我本来以为，对由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所引起的争论不必过于看重，因为我觉得刘晓波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这样说，无非表达了当今民主志士的一种爱和宽容的博大胸怀，而且鉴于刘当前身陷专制牢狱的处境，鉴于“六四”二十多年来中国民主运动所处的艰难困境，我不希望由此引起一场民运人士之间的公开争论。但是，出于我的意料，这场争论不但公开了，而且海外的一些朋友联名写信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哈维尔、达赖喇嘛、图图大主教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就刘晓波被提名为 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一事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把由刘晓波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称为和极权政府合作，暗示狱中的刘晓波是中共特务，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民主志士究竟有没有敌人？这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这就使我觉得有必要参与这一讨论，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饱受政治迫害的异议人士为什么没有敌人？这是由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作为一种制度改革，就跟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它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任何人，而是制度，正如经济改革针对的不是财富的占有者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民主运动针对的也不是当权者而是那些限制言论自由和侵犯公民权利的政治体制。民主

运动所要改变的，并不是国家政权的归属，而是竞争国家政权的游戏规则（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用以打击民主党和异议人士的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何等的荒唐）。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唯一目标，就是《零八宪章》所说的“废除一党执政垄断特权”，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而不是要直接对政治权力进行再分配。这是当代民主运动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也不同于1949年革命的地方。1949年的革命虽然也号称要改变旧的专制制度，但它强调的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对制度的作用，宣称国体决定政体，而不是制度对国家政权的约束作用，所以它把政权问题看作革命的根本问题，把夺取国家政权当作革命的中心任务。相反，当代民主运动把制度问题看作根本问题，它自始至终致力于旧制度的改造和新制度的建构。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基本知识：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按照这个理论，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自然是革命的敌人。遗憾的是，这种革命的必然结果是，它只能造成阶级结构的重新洗牌，使原来的“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成为政治上的压迫者，而使原来的“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成为政治上的被压迫者——1949年的革命就是这个结果。与此相反，当代民主运动的性质却是用一种政治游戏规则代替另一种政治游戏规则，而不是一部分人推翻另一部分人——正如在市场制度下谁当“资产阶级”（老板）谁当“无产阶级”（雇工）完全由市场竞争决定一样，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谁是执政党谁是在野党也完全由竞争性的选举决定。因此，说当代民主运动没有敌人，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也不同于辛亥革命等旧式民主运动，它是一场和平抗争运动，这是由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特点决定的。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各国当代民主运动无不强调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坚持不屈不挠的和平抗争，这是当代民主运动实现其目标的不二手段。和平抗争这一手段立足于两点，第一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没有任何高尚的目标值得用民众的流血牺牲去换取，第二是历史的教训——暴力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诞生新社会的助产婆，而是使社会陷入专制循环的恶魔。和平抗争当然也会有对手，但对手并不是敌人，敌人是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对手则仅仅是你败我胜，共存共进。基督教圣经里虽然有“爱你的敌人”之说，但我的理解，这里的“敌人”仅仅是一种词汇的借用，而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处于你死我活状态的敌人，否则，“爱你的敌人”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威权政府当然会把异议人士当作敌人（敌对分子）来打击，但异议人士即使在民主化以后，也不一定是当政者（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当政是要经由民众选举的，这与一切论功行赏的“造反运动”是不同的），他们纵使成为未来民主政府的当政者，也因为有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无法像专制政府那样把迫害过自己的人当作敌人来打击。

第三，当代民主运动没有敌人，也是由其过程的渐进性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的连续性决定的。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完全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等激烈的方式完成，但是，从专制制度到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变，却是一个制度演化的过程，制度演化的特点是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的连续性。在当代民主运动中，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活动，正是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各国的宪政史，也都是由个案推动的修宪史，而不是破旧立新的废宪史。根据亨廷顿的归纳，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各国民主转型的方式，可以分为“变革”、“移转”和“置换”等三种模式。在台湾、匈牙利、西班牙那样的变革型模式中，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代替一党专政制度，是由执政党或执政集团主动实行政治改革，逐渐开放报禁和党禁实现的；在波兰、捷克、韩国那样的移转型模式中，是反对派或反对党经过长期抗争，迫使执政集团退让和妥协的结果；即使是东德、葡萄牙那样的置换型模式，威权政府的退出也是在国

内外强大压力下的和平“下台”，而不是被“推翻”或“打倒”——被推翻和打倒的只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集团，那是由于其军队内部的分裂造成的，只是个特例。显然，在当代民主运动中，除非在六四那样的特殊场合，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执政党与反对派的关系、政治警察与异议人士的关系以及威权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系等等，一般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

1890年，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把“自然界没有飞跃”作为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的题词，他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连续性，显然，政治制度同样具有连续性，政治制度的演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以激烈的方式完成。回顾中国宪政民主运动一百多年的历史，1898年由康梁发起的立宪运动被镇压以后，孙中山等人领导民众走上了用暴力推翻专制制度的道路，从此以后的近40年间，中华大地战乱不断，1949年的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极权制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这引起了许多智者的反思：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能否靠革命的暴力去摧毁？宪政民主制度能否在革命的枪炮声响过以后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宪政民主制度代替专制极权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究竟可以以激进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还是只能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中国一百多年的宪政史告诉我们：政治领域和自然界一样也没有飞跃，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固然不可能自动到来，但只有经过长期的和平抗争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制度，才是稳定的不易反复的制度。

总之，“我没有敌人”，这表明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既不同于包括1949年革命在内的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也不同于有如辛亥革命的旧式民主运动，她是一种超越了阶级斗争敌对思维、以博爱精神为旨归的新式民主运动，是更高层次上的民主运动，是一场以文明手段进行的温和的政治变革。据说，中共高层把零八宪章定性为“颜色革命的纲领”，我认为这个定性非常准确，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正是一场“颜色革命”，而颜色革命是不会有敌人的。试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中，在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中，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中，在缅甸的“袈裟革命”中，以及在最近一些中国异议人士所提倡的“互联网革命”中，怎么会有“敌人”这个阶级斗争的概念呢？

（二）

进一步说，当代民主运动中的异议人士不仅没有敌人，而且在对专制制度所作的抗争中，对手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早有先例，台湾当年的反对派领袖施明德和追捕他的警官刘展华就是一个例子。施明德曾经两次被国民党专制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坐牢25年，可谓苦大冤深，但他和1979年美丽岛事件以后负责缉捕他的警官刘展华成了好朋友。出狱以后，他轻松地说，自己当年是“钦犯”，当然要努力脱逃，而刘是“快捕”，当然要全力追捕。刘展华退休时办了一个惜别会，施明德就是到场惜别的朋友之一。施明德说过，愿意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献身的人士，光有忍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宽容精神。

把对手看作朋友，这不仅是一种宽容，更是一种基于理性的认识。首先，专制制度对人的伤害是一种制度性伤害，从本质上看，伤害人的是专制制度，而不是专制制度的执行者。我在六四以来20多年的抗争实践中感到，那些政治迫害案的执行者，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仅仅是抱着“履行公务”的心态，并不是有心要整人，他们主观上所要维护的，并不是一党专政的体制，而是自己个人的利益，准确地说，是自己的饭碗。尤其是当前中国的威权政府通行商业原则，在庞大的专政机器上，几乎每一颗螺丝钉都浸透着无利不起早的商业精神，这使得其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被动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其中某些有良知的执行者还能在一些细节上尽可能减轻受害人的

痛苦，比如对受害人狱中的生活实行照顾等等。我相信，刘晓波所说的“柔性化”、“人性化”云云，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其次，作为后极权主义的威权制度虽然是冰冷的，但却是有弹性的，而且执行威权制度的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如果说，在前极权主义时代，专制制度的执行者是“制度的人格化”，那么，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威权制度的执行者则往往会折射出人性的闪光。在威权政府对政治犯、良心犯、宗教犯所实施的迫害案件中，不同素质、不同品行的具体执行者，执行起来对受害人造成的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是大不相同的。记得多年以前，有个曾经多次执行过对我进行拘禁、抄家等任务的当地国保人员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可是罪魁祸首啊！”我真诚地回答：“总是要有人执行的，与其别人来执行，不如由你来执行，我可要感谢你的高抬贵手呵！”他听了很高兴。要知道，在政治迫害案中，作为受害人，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鱼与熊掌的选择，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然，没有敌人并不等于没有罪犯。在民主对专制的抗争中，虽然没有你死我活的敌人，但仍然有触犯刑律的罪犯，而罪犯理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民主化以后，那些政治迫害案的执行者固然不应受到清算，但毋庸讳言，那些政治迫害案件的制造者却是罪犯，那些在执行政治迫害案的过程中对受害人实行酷刑或肉体摧残者也是罪犯。当年在六四事件中奉命执行任务的戒严部队官兵固然不应受到清算，但那些丧心病狂地下令开枪屠杀和平请愿民众的决策者却是罪大恶极的罪犯。对于那些屠杀人民的人，即使将来的民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心赦免，恐怕受害人家属也难以通过（假定这些人到时候还活着）。在这个问题上，韩国就有为人熟知的先例，在光州事件中下令开枪镇压民众的前总统全斗焕，在韩国民主转型以后，被以发动军事政变和内乱罪判处死刑（上诉后减为无期徒刑），全斗焕的帮凶、前总统卢泰愚也因参与内乱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二审减为17年）。但是，罪犯与敌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敌人是政治生活中的概念，而罪犯则是司法领域中的概念，谁都知道，对敌人的惩罚是带着仇恨的，而在惩罚罪犯的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仇恨情绪。

（三）

关于民主运动有没有敌人的分歧，是民运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观点分歧。激进派在民运内部的地位，是跟专制政府对底层民众的欺压程度和对异议人士的迫害程度成比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执政集团中的强硬派处于主导地位，而反对派阵营中的激进派也处于主导地位时，这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就极有可能采取革命式的“置换”形式，转型过程中往往充满动荡和暴力，给民众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甚至有可能使转型变异为一次专制政权的易手，而不是政治制度的变迁。我还能为我们中国人感到幸运的是，目前在反对派阵营中，激进派尚无法主导民主运动，尤其是在反对派力量十分弱小的大陆，海外激进派根本没有市场，即使偶有声音，也为一般民众所反感，不是认为你在大白天说梦话，谁也不当真，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太可怕，还是离你远一点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威权政府无法继续依靠政治高压来维持秩序的情况下，对于那些饱受欺凌的底层民众来说，激进派却是最有号召力的，从而革命也最容易走向极端，这是法国大革命对后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警示。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思：“他一生有过许多敌人，但没有一个是公敌。”这是赞扬马克思之所言所行皆出于公心，出于社会大众的利益。但是，“公敌”、“私敌”之说是一种敌对思维或仇恨思维，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语言，而刘晓波把“我没有敌人”作为法庭最后陈述的主题，这充

分说明他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思维，反映了他的博爱精神和宗教境界，也说明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对自身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民主运动究竟有没有敌人？作为一个学理问题，当然是可以也应该探讨的。但是，如果站在政治操作的角度，对刘晓波提出的“我没有敌人”的说法横加指责，甚至有人指责他仅仅写写文章，没有组织民众上街抗议，我对此十分反感，这就同五年前我很反感一些人对高智晟的街头抗争公开说三道四一样。指责别人不够英雄者，总得自己先做英雄，如果自己躲在安全的彼岸而一味鼓动别人冲锋陷阵，那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以为，世界上最有力的是道德上的感召力，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最缺乏的就是道德感召力。为了增强民主运动的道德感召力，我愿意与一切致力于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共同遵守一个道德戒律：不公开指责正在受迫害的人，哪怕他以前当过线人；不公开指责别人的不英雄行为，即使你自己已经做出了榜样；不公开指责别人的抗争行为，即使其行为显得过于激进或过于软弱。

2010年3月1日临海望江门近江斋

（源于：《民主中国》）

知识分子的职守与放弃

狄 马

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里有一个好故事：新四军六分区的官兵在一次战斗中，误入敌人的埋伏圈，和数倍于自己的日军作战，弹尽粮绝，几近覆灭。在敌人发起最后一轮攻击之前，司令陈大雷把幸存的几个班长叫到一起，布置了最后一场战斗任务，而后有些自得地说，你们几个跟我走上这么一遭，战斗水平个个都赶上连长了，将来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呢！几个班长就都偷着笑，说咱们再过两天就死了，还谈什么将来有啥用啊？陈大雷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我爹在死的前一天还撑着重病到地里种豆，我娘就骂他：老不死的，你干嘛呢！你就是把豆种下了，将来收的时候你也看不到了，你还是歇着吧！我爹就说：我是种地的，死归死，豆还是要种，不能让地荒了。以此类推，陈大雷告诉他的士兵：我们是当兵的，当兵的死归死，战斗素质要传承下去。只要你们守住你们的位置，即使鬼子突破我们的阵地，他也站不住脚，还得给老子滚下去！

现在且不说这部电视剧怎么样，我只说这个故事是个好故事。它实际上讲的是，人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职分。我们在电影上常看到牧师正在布道，一队士兵气势汹汹来到教堂，而牧师讲道不辍，直至长矛刺穿他的胸膛。我们也听说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画一个几何图形，一名罗马士兵来到他面前，要求让路，阿基米德竟然傲慢地做了个手势，说：“闪开！别把我的圆弄坏了！”罗马士兵大怒，挥剑杀死了他。抛开工作的性质不论，单就对自己所事职分的持守与敬虔而言，这故事中的农民并不比倒在圣坛上的牧师和阿基米德差。

我的母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一生经历了父母、兄弟四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以及数不清的来自黑暗政治与家庭暴力的无尽折磨，但即使在最无望、最沉痛的时刻，我也从没有看见

她放下手中的活计。一个恒久不变的动作是：一边干活，一边流泪。眼泪滴下来，滴到正在耕种的黄土里，正在浣洗的衣服上，正在收藏的谷物中，实在不能自控时，就用手背抹一抹，然后继续手中的劳动。在她看来，灾难归灾难，命运归命运，但再大的灾难，再苦的命运，也不能中断正常的劳动。因为劳动是上天赋予人的使命，人从其中经受试炼，也从其中领取快乐，因而只要不死，人就不能停止劳作。

当然，人因为机遇、兴趣和才能不一样，所事的职分以及对职分的敬虔程度也不一样。各种职分之间也并不是天生划界，不可逾越的，它总是随着一个人志趣、能力的改变而自然流转的。但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职分，这种职分对所从事的个人都有一种天然的规定性。比如，在人们的自然观念中，军人就应当保家卫国、守土有责，官员就应当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牧师就应当传播福音、度化世人，就像一个农民就应当秋收冬藏、四时不误一样，这种观念是人类社会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人为划分的产物。比如知识分子这种职分，在西方它是由基督教的先知脱胎而来的，因而天然地拥有代上帝发言，批评地上君王的权利；中国人虽没有严格的宗教观念，但古代的中国人迷信鬼神，因而早先的知识分子都是掌管占卜和天文历算的“巫”和“史”。教育平民化、宗教世俗化以后，无论东西方，知识分子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吃香，但与权力保持距离，时刻保有批评精神，替弱势者、受压迫者说话的传统还是保持了下来。

固然知识分子有多种多样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但不管哪一类知识分子，他们的总体目标都是为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的。因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就在于他比常人拥有更多的智慧与知识，如果他不以自己拥有的智慧与知识，拓展人类的认识边界，丰富被桎梏的想象空间，反而出卖真理，与权力合谋，蒙骗沉默的大多数，他就违反了知识分子这种职分的“天然规定性”。

知识分子是人不是神，与官员、教士、鞋匠、商人、警察、娼寮一样，当然也有“渎职”的时候，但知识分子这种职分的特殊性在于，他的批评职能是建立在自身的正义和道德完好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批评别人的人首先要经得起别人的批评。密涅瓦的猫头鹰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它从来不偷食主人的肉块。一个以批评为业的人，如果他只关心自己的课题经费和职称晋升，东抄西凑，招摇撞骗，他凭什么指责官员贪污受贿，军人临阵脱逃，农民游手好闲？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因而，就性质而言，放弃批判职能，置民众的流血、哀哭于不顾，蛇形匍匐地为权力的合法性寻找圆滑用语的知识分子，与战场上的投敌卖国、反戈一击，教会里的烧杀异端、大卖免罪符，官场中的营私舞弊、残害忠良之辈毫无二致。

当然，与军队、教会、官场中一样，不是人人都有投敌卖国、烧杀异端、残害忠良的权力与机会，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都处于无敌可投、无国可卖、无赃可贪、无异端可烧的境地，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大多数的历史情境里也都处于无凶可帮、无纣可助、甚至想帮忙而不得的境地。因而他们总是觉得无事可干，于是吃茶喝酒、寻花问柳、以文字为游戏，以知识为赏玩就成了千古乐事。相对于神人与恶棍，他们是些不好不坏的人。他们明知什么是正确的，却转身离去。他们害怕显得太过政治化，认为作品一染上政治便不够高雅，让阅听大众觉得他们不冷静、不客观、不中庸，从而失去已经博得的“君子”美誉，落个偏激、不成熟的恶名，但实际上却是没有勇气说出真相，害怕得罪权威与权力机构，故而拿这些托辞自欺欺人。真实的意图是想可靠地留在某大学或某研究机构里，通过发表一些云里雾里谁也不看的“学术论文”——

—据笔者考证，这类论文实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责任编辑，另一个就是作者自己——成为某协会的理事或会长，某教材的主编或编委，某课题的学术带头人或评审组成员。这些知识分子如果拿人生中的其他职分类比的话，他们就相当于战场上的逃兵，农民中的“二流子”，好事做不来，坏事不敢做，既不能增进人类的知识，也不能促成社会的改变。他们东抄西凑的所谓“写作”，并不会带来知识上的新质，在性质上等同于搬运工。

除了“二流子”，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我名之曰“二丑”。“二丑”型知识分子在商言学，在学言商，见人说人话，见官说官话，望风撒种，看云收割，“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语），像日本侵华时的“皇协军”，三分打仗，七分应付，有时也放一两个冷枪，但更多的却是为保存自己。如果还拿人生中的其他职分类比的话，他们就相当于军队里的“兵油子”，官场中“不倒翁”，庙里的“花和尚”，有时也念念经，烧烧香，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揣上二两酒，和后山的小尼姑厮混。

只有极少数人能超越当下的具体利益，向着更高远的目标挺进。他们弃官府，舍学堂，自放于野；不唯上，不唯书，甘为妇孺小子、被遗忘或弃置者代言。他们的生活是游牧的，去中心的，甚至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的，但绝不是犬儒的，无根的，自绝于政府与人民的。他们的立场是反讽的，批评的，甚至是不大正经的，但绝不是违心的，表演的，故步自封的。他们不为反对而反对，但对流通已久的官方叙述、权威说法、主流立场，大众采信的陈词滥调、时髦语法永远抱有一种极深的疑虑。他们对人类生活中那些久远的、神圣的、关乎自由和解放的价值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但对当下的、暂时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爱国主义、集体思想、种族意识有种近乎本能的疏离。他的目标是要利用知识的相关性，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现实与历史之间建立一种可靠而有效的联系，然后通过这种联系为真理和谬误划界。他们是鲁迅说的“叛逆的猛士”——“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总是少数。大部分知识分子不管是由于受人哄骗还是名利的诱惑，总是乐于为官家和体制效劳，尤其是在官方垄断一切荣誉和地位，掌管一切臣民的生存资源甚至生命的时候，要求人人都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做真理的见证，不是梦想，便是呓语。因为与任何行当任何领域一样，要想做一流的人物，必得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牺牲。大多数人终生碌碌无为，并非一定由于才智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放弃安乐。尤其是在国家垄断了一切言论、教育和新闻出版自由，知识分子除了成为体制的薪给人员，其他任何选择都有可能遭遇歧视，甚至沦为终生贱民的可怕社会里，要知识分子人人都放弃优渥的待遇，成为高风险、低保障，没有丝毫尊严的贱民中的一员，无异于痴人说梦。这就是古来天文学家何其多矣，然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总是少数，古来哲学家何其多矣，然萨特、加缪、阿隆总是少数，古来文学家何其多矣，然胡适、鲁迅、陈独秀总是少数的原因——而正是这“少数”构成了人类的真葡萄树。

这些真葡萄树不是权贵的宠儿，但也不是大众的戏子。他们本身拥有自己的法则与秩序，像恒星一样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由于代表的是自由与启蒙，因而大众就成为他们自然的诉求对象，但这个“诉求”是迎合他们的胃口，故意说两句脏话，使他们像客户般地高兴，还是引导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这是区别知识分子真伪的一个大问题。把人民想象成绝对的正义，绝对的邪恶，是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他们以为自己的天职是代表穷人，代表受苦的人，代表人群中一切没有讲话资格和能力

的人，因而就把这生机勃勃的、善恶交织的众生想象成一种抽象的观念，冰冷的神祇，然后供奉他们，膜拜他们，有时又想改造他们，实在不能改造时，就抽打他们，欺瞒他们。实际上知识分子关注、代表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经验，一种川流不息的力量，而不是凝固成一大坨干屎的观念。流行的语汇、先验的主义、做成标本的理论，永远不能代替具体的、散发着血蒸气的个人世界。哪怕这种语汇、主义和理论的确是正确的，的确是经过若干才智出众、道德高超人士检验的。纯粹个人的写作是不存在的，纯粹公共的写作同样子虚乌有。一个负责任、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将自己真实的历史巧妙地融入到公共的价值、立场和写作中去。把“人民”想象成永远正确、无辜的一群，他们的受害、贫穷是因为他们的善良，就是一种纯粹的教条。一般来说，他们中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可一旦有谁掌握了某种权势，马上就会转过来折磨别人，这就是“人民”的宿命。耶稣受审的时候，巡抚彼拉多倒有心放了他，但人民的呼声是：“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看那情形，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反而可能激起暴动，就拿水在群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个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现代中文译本，《马太福音》第27章24节）这个经典的场面浓缩了人民嗜血的全部历史。

知识分子因为要在公共的舞台上作证，他的事业又涉及权势的利益、大众的情绪，因而有可能成为，既是权势的罪犯，又是大众的敌人。他要横站着才能应付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但不管是多么易受攻击，知识分子总要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为天职，哪怕是四面受敌，孤军奋战，哪怕是横死街心，无人收尸——就像我们故事中的那位老农说的：死归死，不能让地荒了。也正如“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日心说”又被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修正一样，从长远来看，某文章的经典论述，某知识分子的伟大发明总会过时，总会被后代的进一步发现所遮蔽超越。唯一能留下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他们在向蒙昧、强权抗争时留下的不屈的精神。就像电视剧中陈大雷对他的士兵说的：我们是当兵的，当兵的死归死，战斗素质要传承下去。只要你们守住你们的位置，即使鬼子突破我们的阵地，他也站不住脚，还得给老子滚下去！这段话移在知识分子身上，就是：知识分子人可以死，但他的精神风骨一定要传承下去。只要我们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哪怕一时乌云遮天，哪怕一朝豺狼当道，这种流风遗韵也一定会感染后来者的心魂。用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死时的话说，就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010年3月25日

（源于：《观察》）

人权、人的尊严与猪权、猪的尊严

王德邦

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在春节团拜会讲话、与网友交流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接连对“让人民生活得更更有尊严”进行阐述，很给人鼓舞。我曾经毫不讳言地跟朋友说，在关于“尊严”的话语上，温家宝先生完全使用了现代文明的价值表达，所说的话跟我们差不多了。

关于尊严的生活，温家宝先生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先后三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所作出的表达，很耐人寻味！第一次在2010年2月12日的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先生在致词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第二次在半个月后的2月27日与网友交流上，温家宝总理说：“我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这就是我讲的尊严的含义”。第三次温家宝先生在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一个国家总理如此集中、高频度地阐述“让人民生活得更更有尊严”，这大概在中外的历史上也属罕见。由此自然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关注，并激起3月每年一度的中国政协与人大两会代表的热议。然而，从已经披露的两会代表对“尊严生活”的理解上，可谓众说纷纭，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更多的对尊严生活的理解，却让人听来感觉不可理喻。

应该说温家宝先生对尊严生活的阐释是精辟的，其中将“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作为尊严的第一要义，注解出了尊严的核心内含与价值。

然而温家宝先生对“让人民生活得更更有尊严”的呼吁，与对何谓尊严生活的精辟阐释，及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作出的“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似乎并没有得到两会代表们的普遍理解，相反一些代表对尊严的解说，已经严重扭曲了尊严的内核，远离了尊严的固有本质。

3月12日《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军队代表委员热议“尊严论” 国家强大才是硬道理》的报道，其中收集了多名代表关于“尊严”的解读。如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委员说：“幸福和尊严简而概之，就是两个字，富！强！形象点说，腰包鼓起来，腰杆硬起来。”另有代表认为“尊严是靠实力说话的！”及“强大，才是硬道理”。另有网络搜集到大学生代表蒋方舟阐述社会对尊严的认识时，如此描述：“如果我告诉同龄人：我读了多少书，知道了多少知识，学习有多好，见了多少人，走了多少地方，根本无法获得他们的尊重；如果我告诉同龄人：我小学就开始自力更生，写稿赚钱，现在已经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就能赢得他们由衷地敬意；如果我告诉他们：我现在已经是老板，赚了很多钱，可以向社会撒钱了，就能赢得他们起立鼓掌。”为此她认为“让

老百姓赶紧有钱吧”，这是尊严时下最好的注解。

看来许多代表委员将现实的金钱作为尊严的注解，认为个体有钱就有了尊严，而国家有钱、强大则有尊严。从各方反应与社会现实来看，这种金钱尊严观应该说在时下是很流行的，甚至可以说它支撑着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评判。

有钱是否真的就有尊严，或者有钱强大了就尊严了呢？从人类历史来看，许多富可敌国的人并不是那么尊严。远者不说，就是时下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其中和坤可谓富可敌国，而纪晓岚却是一介清贫大儒。在电视剧中我们感到谁有尊严？而我们内心对谁会发自肺腑地尊重？当然我不排除有人对和坤的艳羡，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对纪晓岚由衷敬佩而将和坤当作笑料而已。

如果电视剧有太多艺术的虚拟，那么今天中国的富豪又有几人真正能赢得天下百姓的一声由衷的喝彩呢？难道福建远华走私案的赖昌星与今天国美总裁黄光裕曾经与现在的财富不够多？那么他们就那么有尊严？当然这些案子其中可能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政治因素，但他们纵使没有后来的出事，在金钱的后面就真正有强大的尊严内核吗？同样而言，一个国家难道真的是强大了就有尊严了？上世纪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不可谓不强大吧？但是那时他们就很有尊严吗？同样从人类历史的浩瀚书籍中，我们能读到有多少富翁的篇章？而那些“穷且愈坚，不堕青云之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的名言佳句却千古芬芳，润人心田，让人读之肃然起敬！

由此可见，金钱并不是尊严的必然，而强大也未必就能换得尊严。尊严与金钱没有因果关系，最多也就是一个可能的条件而已。对此温家宝先生是有深切理解的，然而中国的两会代表中却许多人固执着金钱就是尊严的思想，并且张扬着这种金钱至上，使金钱社会价值化的观点，这事实是典型的拜金主义的变种。中国自上世纪“八九”那场屠杀后，这个民族就以世俗的金钱来掩盖人类应该持守的价值，进而将尊严金钱化，将权势尊严化，如此颠覆人类固有价值，搞乱社会衡量标准，绑架社会犯罪，使整个社会急速陷入丧失尊严与价值的时代，从而为中国权势的腐化堕落大开精神文化之门，由此导致的民族整体性灾难今天已经日益显现。

温家宝先生的尊严观显然是立足于人类普世价值的准则之上，是以人权平等为内核，以宪法条规为维度，阐释出人类应该遵循的固有价值体系。也即是人权是尊严的根基，平等而完整地享有这个时代人们普遍公认的人权，才是人尊严的真正内含，才可谓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而那些以金钱或权势，或者伪装的所谓强大，来更换尊严的思想，都是抛弃尊严固有价值，颠覆人类普世文明，是为拜金主义张目，为疯狂掠夺、不计后果的 GDP 发展模式开脱。

由温家宝先生与两会权贵代表对尊严的不同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在“尊严”问题上中国社会完全对立的观点，也事实上揭示出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价值分裂。那种延续权贵发展之路的一派，必然将尊严金钱化与金钱尊严化，使人类崇高的尊严价值世俗化为权贵的代称，为权贵经济在精神领域寻找依据。而立足于人类长远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的一派，必然认识到人类共同遵循的人权平等价值，才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健康发展应该遵从之路。也因此享有平等的人权才是一个人尊严的根本。

事实上，只要考察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在人权与人的尊严的分歧上一直存在

着两种对立的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早在上世纪中国不得不探讨人权问题时，并且后来不得不将保护人权写入宪法时，人权就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一方面是以人类普遍认识为准则，以《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为蓝本，认为人类共识的价值内含着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应该遵循的价值；另一方面，将中华民族特殊化，总是通过强调民族的特殊性，来拒斥普世价值。于是人权上就出现了生存权是第一人权，后来又强调发展权高过其他人权。进而在生存与发展的旗帜下，大行无视乃至侵犯、扼杀其他人权的罪恶。早在一批人抛出生存与发展权高过其他人权时，就有学者精辟指出这种割裂人权整体与平等的所谓权利就是“猪权”，因为猪也有生存与发展的必要。由这种“猪权”，我们看到近二十年来的所谓发展，就是野蛮的动物兽性的张扬，是弱肉强食，是强取豪夺，是金钱至上，是权势垄断。现在权贵集团又试图用尊严来寻求他们路径的价值合法性，这是典型的要将“猪权”与“猪的尊严”强加于民族头上。其狼子野心，可谓路人皆知！

中华民族在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时，怎么会出现如此将人权异化为“猪权”，将人的尊严异化成“猪的尊严”的荒唐怪象？这个除了要追溯人性的罪恶与文化的痼疾外，还不能不让人深刻认识到这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这是一个可以将人类文明荒唐化、怪异化的制度，是可以将国家总理的精神公然肤浅、庸俗化的制度。如果不改变这种制度，人类的文明将被糟蹋殆尽，人类固有的价值将被颠覆殆尽，中南海再有好的思想与意愿将被丑化、恶化殆尽。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所谓科学发展观，最后还是被权贵用实际行动注解成了掠夺技巧的更新、贪腐方法的革命，而不是与现代文明与法制接轨的科学。

当此“尊严生活”成为感召人心口号之时，我们如何保持尊严的纯洁，使尊严是人的尊严而不要蜕化为“猪的尊严”，我们就必须坚定地捍卫完整平等的人权，且坚决扼阻那种将人权变成“猪权”的逆行！

2010年3月

（源于：《民主中国》）

【宪章时评】

提升人的尊严

沙叶新

【沙叶新按】我这篇文章是应《中国新闻周刊》之约而写的，该刊属于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它和新华社一样，是国内仅此两家的著名的官方通讯社。隐约记得多年以前他们曾向我约过稿，我没写，是自惭形秽，怕上不了这个档次。这次是该刊的主笔Z先生来电、来信，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让人民更有尊严”，他们想约请几位社会知名人士笔谈“我的尊严观”。他还说他们的总编很喜欢我前年在香港所做的一次演讲《我在香港学习温总理的讲话》，并特地推荐给他看了，总编很希望我用那次演讲的风格来点评温总理的这次关于尊严的讲话。Z先生殷切而诚恳，我被打动，答应写了。我为文一向认真，不想写成应景文章。但目前中国，认假而不认真；认假大行其道，认真寸步难行。说话、著文也是如此。我担心我认真去写，必然有所阻碍，或被删改，或被和谐。数天后，3月10日，我的文章登出。大部分被保留，删掉最后一段，这已经很不容易，因为尺度不一样，我能理解。现在全文发在我博客上，并做了某些增补。

■ 为什么到这么晚的时候人的尊严才受到尊重？——黑格尔

温家宝总理是历届总理中具有悲悯之心和人文素养的一位，所以他常含泪水，我宁愿相信他是真诚的；所以他言辞动人，我宁愿相信他不是卖弄。他的公开演讲或即席答问，每每引用自己或别人的诗句，脱口而出，文采斐然：“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都传诵一时。即便在严肃刻板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些情意甚浓的警句格言，令人遐想。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温家宝言之有文，所以行之遐迩，这在高层官场中实为少见。

最近温家宝总理有句话，却并不因为文采，也不因为诗意，而是因为这句话的内容引起广泛热议。2月12日他在虎年团拜会上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信言不美，至言不繁。3月5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又重复了这句话，而且这次是在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宣告的，是代表中央政府郑重陈说的，是要印制在“国情咨文”式的重要官方文件上的，可见此时此地重复此话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这句话中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宗旨，3年以前的中共十七大的报告就告知人民：“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如此算来，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中国人民创造了89年的幸福生活了，四代以上的亿万中国人民早已生活在幸福之中。2008年有一官方网站为了证实中国人民的幸福，独家对某一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告知大家：93.9%的人认为非常幸福或者比较幸福，只有2.1%的人认为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按以往的政治统计术语，这2.1%的人显然是“一小撮”的“一小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一个据说是英国人对全球幸福指数的调查，在被调查的178个国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高居全球的第31位，远在韩国和日本之上！如果中国人再说自己不

幸福，那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因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在中国已不成问题，所以没引起多大注意，倒是“更有尊严”这后半句激起国内外极大反响。为何？因为罕见，因为珍稀，89年来，从未听说；解放之后，更是讳莫如深，使得“尊严”一词好似来自外星，新奇耀眼，不胫而走。

何谓“尊严”？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和网民在线交流时有所阐明，共三点，说的很好，不赘述，只补充几点以附骥。我以为：

一、若要让人有尊严，首先让人有金钱。

中国政府如今有的是钱，中国的GDP已雄居前四名之内，国家的钞票是大大的有，财大气粗，连美国也向中国借钱。但中国老百姓有钱吗？中国的人均GDP如何呢？据学者刘植荣先生研究，中国的人均GDP竟在世界排名第99位，而我们最低工资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了第158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尽管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准有所提升，但总的来说还是“国富民穷”！据官方杂志《瞭望》报道，脱贫依然是非常严重的任务，中国贫困人口尚有4000多万，这个数字是否“缩水”值得怀疑；即便准确，也可能此处脱贫，另处又贫；甚至贫未脱，反而更加贫，致使贫困人口越来越多。

如果很多贫民没钱读书，没钱买房，没钱就医，哪来尊严？更遑论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农民工！如果到西北去看看，到山区去看看，有些贫户，家徒四壁，而且是破壁，真可谓“箪门圭罄，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这不是回到了“解放前”，不是回到了“旧社会”，当地老人说，“解放前”和“旧社会”也比现在好多了！如此贫困，怎能奢谈尊严！再说曾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十年寒窗”之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住的却是蜗牛屋，甚至是蚂蚁铺，连基本的体面都没有，更别说尊严了！政府有钱并非坏事，但必须藏富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更重要的是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而不是先让贪官、衙内、奸商、黑帮富起来，这才是利民利国之道，也才是人民确有尊严之关键。

二、若要让人有尊严，必须让人有民权。

“民权”是国民党信奉的“三民主义”的核心，而在大陆是为敏感辞汇，不许说，不许论，甚至不能见之于书籍报章，看也不能看见这个词，所以在大陆绝迹多年，连词汇量最为完备的权威辞典新版《辞海》竟然也不收此词。多年以前我们还竭力讳言通行世界的“人权”一词，都是可笑的闭目塞听的鸵鸟政策。而如今“人权”已经喧腾于口，见诸所有媒体，“民权”也剥去意识形态的硬壳，不再视为洪水猛兽。

其实，民权就是公民在政治领域里享有的民主权利。廖仲恺有个通俗的解释，他说“民权在法律上说，就是人民有不许别人侵犯他的身体、言论、信仰、住居、集会种种自由的权。”我们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有类似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只是在实际生活中，看不到这些自由，因为所有的“自由言论”都被视为“非法言论”、所有的“自由出版”都被看作“非法出版”、所有的“自由组织”都被打成“非法组织”、所有的“自由集会”都被判为“非法集会”；好像中国所有这些自由都是“非法”的，没“合法”的。即便最为普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数十年来在当代中国也没真

正有过一次，因而如今只得把“游行”统统改成“散步”、改成“荡马路”了。如果没有这些自由，尊严何在呢？对于尊严而言，自由比民主、比平等更重要。不真正实施《宪法》所规定的以上诸种自由，尊严便是道道地地的空言。

三、若要让人有尊严，根本要把人当人！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对人的生命并不尊重，难道是物以稀为贵、人以多为贱？当代始皇曾主张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还说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换来一个大同世界还是值得的。这段伟论未见之官方文件，有人在内部书刊上见过。但就其暴戾恣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言，这番言论非发动过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者莫属，仅就语言风格而言也非他莫属。当代始皇坐天下之时，他是不把人当人的，只当内外战争和政治运动的炮灰。

尊严来自对人尊重，根本的、最起码的是要把人当人，要切实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

所以，不能把人当螺钉，不能把人当齿轮。不能把人当傀儡，不能把人当牺牲。不能把人当砧板上的肉，不能把人当磨盘中的油。不能让人只准举手，不能让人不准摇头。不能把人打成“右派”，不能把人打成“胡风”。不能把人划作“黑五类”，不能把人定为“七种人”。不能强行拆毁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发声。不能把人打死说成是“躲猫猫”，不能把人判刑是因为他的言论。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代表当作投票机器一台，不能把委以重任委员当作御用花瓶一尊。不能禁止得奖的作家出国领奖，不能把返国的公民堵在国门。不能让人随便地请喝咖啡、请喝茶，不能让人任意地被代表、被替身。什么时候真正的以人为本，什么时候真的把人当成人，中国人的尊严就成真！

2010年3月9日于上海善作剧楼

（源于：沙叶新的博客）

谷歌的“不作恶”与中国当局的“贼喊捉贼”

小 乔

在经过最后一轮争取、较量与碰撞之后，谷歌终于在人们依依惜别的眼光中，暂别拥有世界最多网民的中国大陆市场。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谷歌中国停止对其搜索、新闻及图片服务进行过滤审查，并将 google.cn 转向香港引擎 google.com.hk，通过位于香港的服务器以简体中文提供未经审查的搜寻结果。谷歌表示，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中国政府明白无误地表明“自我审查是一个不可谈判的法律要求”。

对于一个商业公司退出中国市场的决定，中国当局迅即做出反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负责人23日清晨就谷歌公司宣布撤出中国大陆发表谈话称：“谷歌公司违背进入中国市场时作出的书面承诺，停止对搜索服务进行过滤，并就黑客攻击影射和指责中国，这是完全错误的。我

们坚决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

从这位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负责人的谈话可以看出，所谓“谷歌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作出的书面承诺”，就是同意对搜索服务进行过滤审查，但查现行中国法律，并没有任何一条明文规定搜索引擎公司该如何自我审查，哪些内容和字句应当过滤屏蔽，相反中国宪法倒是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显然真正违反法律、剥夺公民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恰恰是中国政府。

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谷歌的主要业务就是搜索信息，它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标准化的商业运作模式，为公众提供尽可能全面、详尽的搜索信息，这是谷歌所应遵循的商业伦理与核心利益所在。但它遇上了一个以信息封锁为基本统治手段的专制政权，这个专制政权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靠信息封锁实行“愚民政策”维持其统治，强制包括谷歌在内的网络营运商自我过滤审查，屏蔽所谓“敏感信息”，等同于强制谷歌等公司向用户提供虚假信息，向消费者提供类似“毒奶粉”的假冒伪劣产品。任何恪守商业伦理道德、珍惜自身商誉的商家，都不可能长期屈从于这样的无理要求。几年前谷歌进入中国市场时被迫做出妥协，或许以为那样的不合理要求只是暂时的，以后会逐步改观，但几年过去，中共的网络封锁非但没见丝毫松动，反而变本加厉，加之受到黑客攻击和技术机密被窃取，谷歌终于受够了。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投入巨资打造“金盾工程”的“网络柏林墙”，对国际互联网信息实行严密封堵，这样一个剥夺言论自由权利、实行严格的信息审查、阉割网络自由信息的政府，却公然指责别人“将商业问题政治化”，真可谓“贼喊捉贼”。以互联网为敌，实行信息时代的“闭关锁国”，这在当今世界只有北韩、伊朗、古巴等极少数几个倒行逆施的国家与之为伍。谷歌为捍卫自身权利、坚守其“不作恶”的理念而退出中国，这对中共而言，的确远不止一个商业公司的商业决定，而是一个政治影响深远的姿态，是在全世界面前撕去中国当局“与国际接轨”、“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的伪装，给挟中国大陆市场大蛋糕以自重、蛮横霸道的专制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对其他外资企业将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中国网民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谷歌的敬佩和留恋。23日当晚，北京数十网民到谷歌北京总部门前献花、点燃蜡烛，有网友在谷歌的Logo上留纸条赠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还有人改写美钞上的口号语为：In Google We Trust。聚会晚上10时左右被警察驱散，网友们唱起了讽刺网络审查的《草泥马之歌》。也有中国网民无奈地说：You can choose stay or leave, we don't have any choice but have to stay。（你可以选择留下或离开，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留下。）而中国大陆受当局严密控制的纸媒接到通知，对谷歌事件的报道只能采取官方口径；在国内各门户网站上，则大量删除支持谷歌的留言，只剩下一边倒支持政府立场的言论，网络审查制度下的舆论导向，以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制造虚假民意，试图掀起新一轮极端民族主义狂潮。

谷歌引起的冲击波才刚刚开始。很明显，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网络搜索网站，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检索信息的重要工具，人们留恋他，不愿让它离去。由于中国当局对Twitter、YouTube、Facebook和Blogger等网站的持续屏蔽，目前谷歌提供的在香港服务器上未经审查的服务的访问有可能随时被中断，失去谷歌搜索引擎的大陆科技工作者、学生和其他各阶层人士——主要是大陆的精英、知识阶层，他们或许今后还面临失去谷歌电邮和谷歌文档的局面，这将导致更多人尝试翻越网络信息“柏林墙”，进入不受监控的互联网的人数将激增。

谷歌已经宣布将密切监测网址访问问题，并制作了一个新页面，用户可以实时了解到在中国哪些 Google 服务是可用的。以谷歌所拥有的雄厚的技术实力，完全有能力开发出更强大的拆“墙”工具，帮助渴望自由信息流通的中国大陆网民拆掉中共的“信息柏林墙”，这也将有助于让谷歌早日重返自由的中国大陆。所有在中国大陆要求基本人权、基本的言论自由的公民，目前面临的何尝不是谷歌同样的困境？可惜的是，中国公民不可能都像谷歌一样选择随时离去，那就只剩下两种选择：“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自由的言论表达和信息流通是公民的天赋人权，是公民社会和法治的基础。我们只有起而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应得的权利，捍卫我们的生活免于强权的践踏。我们别无选择。互联网是无国界的，我们期待更多的人们像谷歌那样基于自由的普世理念，帮助中国人民一起来摧毁这道无形的空中“柏林墙”。自由的信息流通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的经济利益和长远的和平发展。我们期待着自由战胜专制的那一天，谷歌的归来。

2010年3月24日于瑞典

（源于：《民主中国》）

郭建梅及其团队声明

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我们的话：

3月25日，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发布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的机构撤消公告，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是被撤消的四家机构之一。消息发布之后的几天以来，我们得到了媒体、各 NGO、合作伙伴、相关机构、朋友们以及被我们帮助过的当事人的关心和支持，我们深为感动，深表感谢！

对于一个15年一直在不懈努力和奋斗的机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故，而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对机构自身，因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不仅仅是一个机构的名称，而是一个有深刻含义的符号。对国家而言，她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对我们的当事人而言，她代表温暖和希望；对 NGO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而言，她是共同为中国法治和公民社会奋斗的战友；对社会公众而言，她体现了社会良心和法律精神；而对每一位中心的成员而言，她是我们共同的家。

因此，我们想对这个已成为历史的名字，想对所有关心她和我们的人说上几句。以下为我们的声明：

一、15年来，我们从事的是“比太阳还要光辉”的事业。

1995年中心成立之时起，就以厉行法律援助，维护妇女权益，推动性别平等为目标，公平和正义成为中心、也成为中心每一个成员所奉行的理念和理想。作为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的公益性机构，中心是中国民间法律援助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在贫弱群体的巨大需求和政

府法律援助资源不足的状况之下，中心探索的民间法律援助模式成为政府法律援助的有益补充，也让近 10 万权益受侵害的妇女争取到了应有的权益。2004 年，为了适应妇女权益保护多元化发展的需要，中心率先开展了妇女权益领域的公益诉讼，并成为中国公益法律活动的积极推动者。在中国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建立的状况下，中心实践先行，将妇女个体权益的保护和整体性权益的维护相结合，以推动法律政策的改革为目标，办理了大量典型性、影响性案件，范围涉及职场性别歧视、妇女的劳动权益、职场性骚扰、针对妇女的暴力、外来女工权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等涉及妇女权益的重点和难点领域，并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立法倡导，大大扩展了受益人群。

中心的帮助，让贫弱女性感受到了法律和法律援助的力量。一个当事人对我们说，中心就像一盏灯，让她们看到了公平和正义的光亮，让她们在寒冷中感受到温暖，让前行的路不再黑暗。她的话，表达了很多当事人的心声，也说出了我们从事这份事业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中心以自身的影响力带动了很多的后来者，也在这个过程中，中心自觉承担了法律援助、公益诉讼和公益法律活动倡导者以及公益律师孵化平台的使命。2002 年，中心发起成立了中国法律援助协作小组，旨在让更多的组织和机构加入法律援助的队伍，2007 年中心发起成立“妇女权益公益律师网络”，并于 2009 年更名为“公益律师网络”，目前已有超过 300 名涉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优秀律师加入网络并为数千贫弱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在 2009 年 3 月 15 日于北大百年讲堂举办的网络启动仪式上，司法部法律援助司、国家法律援助中心、全国律师协会、北京市律师协会等相关部门领导到会支持，而北大法学院朱苏力院长的祝贺讲话仍让我们记忆犹新。

2009 年 9 月，以中心为依托，中心主任、著名公益律师郭建梅组建成立了千千律师事务所，千千所以专职公益律师专职开展公益法律活动为机构特色和发展模式，积极推动公益律师的专门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并将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的关注点扩大到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等更广泛的弱势群体。

15 年来，由于极具创新性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惠泽广大贫弱女性的同时，也让中心成长为一个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 NGO，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诸多的荣誉，并得到了北京大学的高度赞誉和肯定。2006 年 2 月，时任北大书记的闵维方先生和北大校长的许智宏先生在祝贺中心成立 10 周年的贺信中写道：“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秉承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积极探索、勇于开拓、不断进取，取得了骄人成绩，为推动中国妇女权益保护和法律援助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以及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支持和赞誉，获得了广大妇女的认可与尊重，为北大赢得了荣誉！”

温家宝总理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句话体现了公平和正义对于每一个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至高无尚的价值和意义。中心就是这项光辉事业积极的、坚定的践行者。

二、困难，给我们的不是气馁，而是更加坚定的信念。

被撤消，并不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只是无数个困难之后的又一个而已。中心在成立之初就险些夭折，之后，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接踵而至。首先是经费问题。中国尚未建立起较为顺畅和规范化的 NGO 筹资体系和制度，经费的制约成为 NGO 发展的瓶颈，也是中心发展过程中

面临的重要困难；而人才问题也一直是困扰 NGO 发展的重大障碍，特别是中心这样一个需要较高法律专业知识和资质的专业性机构，如何在社会公益意识不强，趋功逐利心态过强的环境下吸引并留住人才，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奉献与待遇、精神与物质的冲突和矛盾一直是中心的一大难题；还有相关法律体系、执法环境的不完善，行政干预司法和地方保护、行业保护的影响，甚至是司法中的腐败现象，都给中心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长期超强度的工作负荷也让中心成员身心压力极大，这种透支状态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变成一个难以缓解的问题。

被撤消，也并不是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我们甚至受到过生命的威胁。在那个偏僻的乡村，不懂法的村民在我们坚定的目光下不由自主地扔掉手里的棍棒时，我们就明白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困难，只是怯懦者的挡箭牌，而对有着坚定信念的前行者来说，困难是另一种动力，是春前的一场雪，雪总是要化的，而满山的红绿一定会随着春风无可阻挡地绽放！

三、别了，北大！不别的是我们对公平和正义永远的追求，对中国法治坚定不移的信念。

中心好几位专职成员都毕业于北大。未名湖给了他们知识和精神的滋养，北大的民主和人文情怀给了他们选择公益之路最初的精神动力。这也是面对被撤消，郭建梅为什么会说感到悲凉。这不是她想像中的北大。是依照北大先辈们和北大精神的指引，她义无反顾地走上公益之路。因此，她的悲凉，让人们感到更加的悲情和震撼。

但是，悲凉的郭建梅和她的团队心中依然热血沸腾，激情燃烧，因为他们坚信，法律援助和公益法律事业是民众的需要，是和谐社会的需要，并为 15 年中心的实践所证明，为贫弱当事人送给中心的小米、红薯和几百面锦旗所体现，为中心获得的各类奖项所诠释。

更何况，中心虽撤，而千千所犹在。

中心在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和 NGO 三个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至少给人以这样的启示：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生存在中国不仅需要，而且将发挥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在现实的中国，要开创一项前瞻性的事业，需要一批为之奋斗和奉献的勇士，并给予认可和激励。

面对未来的灿烂之霞，我们将继续行路。尽管前路仍不平坦，风景也并非都是绿水青山，但又有什么呢，生命的意义，在于脚踏实地的行进，在于百折不回的勇气，在于我们朝着自己的理想向前走的每一步。

我们无怨无悔。

再次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机构和朋友，在路上，我们同行。

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2010年4月1日

（源于：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纪录片《克拉玛依》被大陆当局禁播

李 莉

16 年前发生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夺去 288 名学童生命的一场大火，被大陆导演徐辛拍制成纪录片，揭露事件的真相。但纪录片已被大陆当局禁播。事发时现场传来“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的声音，令在场的领导全部安然逃出生天。直至目前，仍有家长坚持上访，希望为死去的儿女讨回公道。

片长近六小时的纪录片《克拉玛依》，是南京导演徐辛经过三年时间，走访新疆克拉玛依六十多个家庭，最后将 13 个遇难学生家长，亲身讲述事件经过的拍摄片段，及大火当日珍贵的视像资料剪辑而成。纪录片刚于周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随即引起外界关注。

导演徐辛周三接受本台访问，对于影片能在香港上映，他感到很高兴，他说拍摄这部片带给他的是煎熬，一方面希望透过影片让人们不要忘记这次惨痛的经历，但拍摄过程中听到家长们哭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身为导演也难以控制自己情绪，多次流下男儿泪。

他说：我在后期在剪接的时候，因为无法控制自己，对我来讲让我有一个很大冲动，让我也静下来去做一些思考，我也希望通过这片子，让更多观众、更多中国观众去了解事件，然后思考。

1994 年 12 月 8 日，新疆克拉玛依教育局领导为了欢迎上级前来评估，安排 800 多名全市最优秀的学生在友谊馆汇演，表演途中怀疑灯光过热引发大火，在场领导一句“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让 288 名服从指令的学生葬身火海，领导却全部安全逃离火场，事后多名领导被控“玩忽职守”罪名，被判监 4 至 7 年。当局曾承诺为事件负责及为遇难学生立碑，但十多年来都未有兑现承诺，连死亡证也没有发。

虽然事件已过 16 载，但不少遇难家长到今天仍难忘伤痛，在克拉玛依土生土长的徐红，提起当年十岁女儿胡小月被大火活活烧死，仍难掩痛心。她说：我们的孩子没有了，但孩子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还是保留著，每当一想起孩子，我们的心里特别难过，我觉得这孩子死得太冤了。

徐红表示，现在很多遇难家长或离世了，或离开了避免触景生情，只剩下十多个家庭，仍坚持上访，希望为死去的儿女讨回公道，讨回一张死亡证。

徐辛导演说，时至今天类似的悲剧仍不断发生，例如四川豆腐渣工程、三聚青胺、疫苗问题，令无数无辜的儿童受害，他说纪录片旧事重提，是希望后人记住事件教训，引以为戒。他说：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断的发生？以前发生过，现在也发生，将来可能也会发生？最大的心愿是更多中国人、更多华人能够看到，包括我们的领导、中央的领导。

徐辛过去拍制多部纪录片都关注中国基层的生活，如其他纪录片一样，《克拉玛依》被大陆当局禁播，徐辛认为纪录片是历史的一部分，希望终有一天，全中国人民也有机会看到历史的教训。

2010 年 3 月 31 日

(源于：RFA)

【经典文献】

美国独立宣言

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於一七七五年四月开始。随著战争的延续，和解的希望逐渐消失，完全独立已成为殖民地的目标。一七七六年六月七日，在大陆会议的一次集会中，维吉尼亚的理查·亨利·李提出一个议案，宣称：这些殖民地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六月十日大陆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独立宣言。实际的起草工作由汤玛斯·杰佛逊负责。七月四日独立宣言获得通过，并分送十三州的议会签署及批准。

独立宣言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明政治哲学——民主与自由的哲学，内容深刻动人；

第二部分列举若干具体的不平事例，以证明乔治三世破坏了美国的自由；

第三部分郑重宣布独立，并宣誓支持该项宣言。

大陆会议（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

美利坚合众国十三个州一致通过的独立宣言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於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於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於专制统治之下时，那麼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迫切而极为必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不生效，等待他的同意；而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对它们就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绝批准便利广大地区人民的其他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异乎寻常的、极为不便的、远离它们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於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旨。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它们以无畏的坚毅态度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後，又长期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取消的，因此这项权力仍由一般人民来行使。其时各州仍然处於危险的境地，既有外来侵略之患，又有发生内乱之忧。

他竭力抑制我们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地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藉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

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於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他建立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於民政之外，并凌驾於民政之上。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於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那些人炮制的各种伪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他们杀害我们各州居民而仍然逍遥法外；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徵税；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编造罪名押送我们到海外去受审；在一个邻省废除英国的自由法制，在那里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该省疆界，企图把该省变成既是一个样板又是一值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进而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极权统治；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且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他宣布我们已不属他保护之列，并对我们作战，从而放弃了在这里的政务。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

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都难以找到先例。他完全不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在公海上俘虏我们的同胞，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是死於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手下。

他在我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追撞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改善；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覆是屡次遭受损害。一个君主，当他的品格已打上了暴君行为的烙印时，是不配作自由人民的统治者的。

我们不是没有顾念我们英国的弟兄。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来这里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雅量呼吁，我们恳求他们念在同种同宗的份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彼此的关系和往来。但是他们对于这种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也同样充耳不闻。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宣布和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和我们作战，就是敌人；和我们和好，就是朋友。

因此，我们，在大陆会议下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非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

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

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

（源于：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美国历史文献/2004年1月25日转发）